

「橋接」數位分歧： 歐盟在印太數位治理中的角色*

張詠詠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亞太區域研究博士班副教授

摘要

在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數位領域已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重塑全球治理、安全與經濟格局。美中日益激烈的科技競爭正在加速全球數位秩序的分化，其核心問題在於全球網路治理規範的分歧，反映出不同價值觀與政策優先事項的對立。在此背景下，印太地區憑藉其經濟潛力與科技創新能力，成為推動數位轉型與治理的關鍵戰場。

除了美中競爭，歐盟（EU）作為全球規範性權力（Normative Power Europe, NPE），也試圖在印太地區的數位秩序中發揮影響。然而，相較於美國以市場驅動（market-driven）模式與中國以國家主導（state-led）模式競逐數位領導權，歐盟的角色仍顯模糊，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其在數位治理領域的影響力及戰略定位。

本研究分析歐盟在數據治理、數位市場經濟及網路安全等領域的規範性影響，並探討其在美中競爭格局下如何維持戰略自主性。本文借鑑 Paulus（2024）提出的「規範能動性」（Normative Agency）框架，以評

* 本文承蒙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114-2410-H-259-017-MY2）之支持，得以順利完成；作者謹向匿名審查委員及編輯委員會致上誠摯謝意，感謝惠予作者極為寶貴之修正建議。

估歐盟在全球數位治理中的行動方式與影響途徑，並透過政策文件分析、學術文獻檢視及比較分析，評估歐盟在全球數位治理中的規範性影響。

本文主張，歐盟主要透過「規範橋樑搭建者」（Norm Bridge-Builder）的角色，嘗試在美中對立的數位治理模式之間進行橋接，提供一條折衷且具包容性的路徑，推動跨境數據流通、數位經濟公平競爭與以人為本的數位規範。然而，歐盟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仍受到內部政策一致性、經濟技術實力、美中競爭壓力及當地國家戰略考量等因素的制約。

文章首先回顧全球數位治理的競爭態勢與歐盟的規範性角色，接續介紹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並透過案例分析歐盟在印太地區的相關實踐，最後探討其在形塑數位秩序過程中的挑戰與機遇，以期為歐盟未來的數位戰略提供參考。

關鍵詞：歐盟、數位治理、中美強權競爭、印太戰略、規範性權力

* * *

壹、前言

在數位科技迅速演進的脈絡下，數位領域已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場域，正持續重塑全球治理、安全與經濟發展的整體格局。各國將數位技術視為戰略資產的趨勢日益明確，尤以美中兩強在關鍵技術上的角力最為顯著。當前，雙方圍繞半導體、人工智慧、5G與網路安全等領域展開全方位競爭，並透過政策工具、經濟槓桿與供應鏈重構等手段，企圖改寫全球科技體系的權力分配。此種動態使科技與地緣政治進一步交織，亦使數位治理超越技術管理的範疇，而與國家安全、經濟利益與國際秩序重組緊密相連。換言之，競爭焦點並非僅止於技術主導權，更觸及數位規範與治理理念的價值對立（Chen and Yang 2022; Flonk, Jachtenfuchs, and Obendiek 2020; Gao 2022; Kharlamov and Pogrebna 2019; Pijović 2021）。簡言之，美中日益激烈的科技競逐正加速全球數位秩序的分化與重組。在此背景下，印太地區憑藉龐大的市場規模、強勁的創新動能與高度的技術應用潛力，逐漸成為全球數位治理與科技領導權競逐的

關鍵節點（He and Li 2020; Hu 2020; Rim 2023; Zhao 2023）。然而，區域內部數位發展不均，日本、南韓與新加坡等已建構進步的監管與基礎設施，許多發展中經濟體卻仍面臨連結不足、技術能力有限與制度設計薄弱等挑戰（GSMA 2021）。這些差異衍生出強烈的「需求面」：各國亟需資源投入、標準對接與制度建構支持，以兼顧普及性、安全性與治理效能。新冠疫情更凸顯此等需求，推動印太國家積極尋求外部合作與夥伴關係，以提升競爭力與韌性（Ford and Clifford 2021; Runde, Savoy, and Murphy 2020）。作為美中戰略布局的交匯點，區域內國家在追求成長與創新的同時，亦須在推動市場開放、維護數位安全，以及確保制度選擇的相容性之間，審慎權衡，以尋求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數位發展路徑與國際合作模式。在兩極化趨勢漸增之際，這些國家面臨艱鉅抉擇：如何在不同治理模式之間定位自身？又如何在維繫主權與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回應國際合作的需求？這些難題使全球數位治理的未來更加不確定且充滿張力。然而，印太數位格局並非僅由美中主導，區域外主要行為者亦試圖介入，以避免在新興數位秩序中被邊緣化。歐盟（EU）作為以規範性影響力著稱的國際行為者，近年亦積極調整對印太的戰略布局。歐盟透過《歐盟印太合作戰略》（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凸顯該地區的重要性，並在數位基礎設施、網路安全與技術標準等面向深化參與，意在以規則為本的方式塑造區域秩序。惟相較於美中的明確戰略競逐與資源投射，歐盟在印太的角色定位仍顯模糊，其規範輸出能力與實質影響範圍亦受到限制與質疑。據此，本文提出以下核心研究問題：在日益兩極化的數位治理競爭中，歐盟能發揮何種實質作用？其是否具備能力在印太地區提出一種有別於美中主導路徑的數位治理選項？又能否在維持其戰略自主性的前提下，於區域數位發展進程中發揮更具建設性的影響力？

基於此，本文將關注以下兩個核心問題：

- 一、歐盟如何透過其規範性權力（Normative Power）參與全球網路治理規範的發展？對印太地區的數位治理有何影響？
- 二、在美國與中國競逐印太數位治理主導權的背景下，歐盟能如何調整其對外策略，以維持規範性影響力？又能否在鞏固其戰略自主性的同時，擴展其在區域數位治理中的影響空間？

本文借鑑Paulus（2024）提出的「規範能動性」（Normative Agency）分析框架，主張歐盟在全球數位治理中扮演「規範橋樑」的角色：定位其為一種超越美中對立、具有整合潛力的規範性行為者。歐盟並非意在「取代」或「平衡」兩強，而是為印太國家提供有別於強權陣營的新選擇。具體而言，歐盟透過規範中介¹的方式回應美中的數位對立，提出兼顧市場開放、個人權利與數位安全的「中間路線」，作為促成規範調和與制度共識的折衷方案。同時，歐盟亦運用數位外交，積極與印太地區原本較為被動的參與者建立夥伴關係，透過資源投入、技術合作與制度倡議，強化其在數位轉型與規範制定中的參與度，推動「以人為本」（human-centric）、重視基本權利的數位秩序。

所謂『橋接』，並不是要歐盟成為美中對立的仲裁者，而是指其在重視人權、協調規範以及設計制度方面，展現出與兩強不同且具建設性的參與方式。本文所界定的「橋接」，更接近於提供印太國家多元制度選項，並透過合作倡議、價值倡導與能力建構，增進各國在數位轉型中的自主性；其目的不是介入美中領導地位的競逐，亦非壟斷區域規範整合的方向。換言之，歐盟更像是「開放式規範平台的提供者」，而非單向輸出的「規範霸權」。此一角色設定既呼應歐盟「以人為本」、「權利導向」（rights-based）的治理價值，也符合其印太戰略中強調促進夥伴關係、增強韌性與擴展選擇的政策基調（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Kliem 2021）。

基於上述定位，本文旨在深化對數位地緣政治格局的理解，並為歐盟未來數位戰略與印太地區的數位發展提供參考。全文結構如下：第一部分說明研究背景、問題意識與論述焦點，作為文章分析起始點。第二部分回顧關於全球網路規範、網路空間治理、數位主權與數位秩序，以及歐盟規範性權力的相關文獻。第三部分介紹Paulus（2024）的「規範能動性」理論框架並概述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分析歐盟在印太的數位治理戰略與相關措施，著重其「規範橋樑」的運作機制。第五部分總結歐盟在形塑印太數位秩序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並反思其在全球數位治理的角色定位及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¹ 本文所指的「中介」，非著重於仲裁或調停以促成合意的功能，而在其「居中」的立場——以橋樑角色銜接差異、調和歧異。

貳、文獻回顧

一、全球網路治理與規範的碎片化

全球網路規範的發展長期陷於爭議與分歧。聯合國雖致力於建構具規範性的國際共識，以形塑共同的網路治理框架，但迄今仍未形成能明確界定國家責任與行為準則的統一規範，導致各國對相關規範的理解與實踐方式呈現高度歧異，遂使全球網路治理呈現出高度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格局（Katagiri 2021; Lantis and Bloomberg 2018; Mačák 2017; Maurer 2020）。

針對碎片化的原因，學界提出諸多解釋。一派觀點強調各地區與國家在利益訴求、戰略優先順序、外交文化、國際地位、身份認同、制度結構與國際話語權配置等方面的差異，導致各方在數位治理模式上的偏好與主導能力各異，從而削弱推動跨國合作與政策協調的可能性（Chen and Yang 2022; Segate 2019; Maurer 2020）。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分歧不僅來自各國數位發展階段的差異，更反映了長期累積的歷史背景與結構性不對等關係，包含後殖民語境中的制度認同落差、治理經驗的不對稱，以及對全球規範由誰界定的質疑，進一步加深了全球數位治理協商的困難度（Segate 2019）。Hansel（2023）的研究指出，全球數位規範之所以難以建立，癥結不只在政策立場差異，而是大國就網路治理所採用的敘事框架彼此衝突，承載不同價值與認知，導致即使表面上有所共識，實質上對其內涵與實踐方式的詮釋卻大相逕庭，這種敘事落差構成數位規範協商的結構性障礙。更甚的是，許多國家為維護自身制度自主性與數位資產主權，轉向制定具本土特色且相對封閉的治理框架；此種各自為政，乃至不相容的監管與治理安排，進而催生「數位治理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的現象（Polatin-Reuben and Wright 2014; Gao 2022; Lantis and Bloomberg 2018; Oxford Analytica 2021; Couture and Toupin 2019）。儘管此類「因地制宜」的治理策略有助於回應國內需求、保障「數位主權」（Digital Sovereignty），但也同步增加了全球治理架構的制度複雜性，進而提升多邊協商與集體應對網路安全挑戰的難度。從制度與法律面向觀之，碎片化亦揭示現行國際法在網路空間規範上，缺乏足夠的指引力、拘束力與整合功能。相關研究因而轉向檢

視國際法基礎，指出缺乏具體且一致的指導原則是全球網路治理的關鍵瓶頸（Haataja 2022; Katagiri 2021; Mačák 2017）。其中，Mačák（2017）強調，國家未能積極承擔國際法制定者的角色，導致網路治理陷入「法律真空」。這一缺口隨後由非國家行為者（如企業、技術團體）填補，形成以「軟性規範」為主的治理架構；雖能在短期內提供指引，但長遠而言卻可能削弱國際法的正當性與一致性，進而動搖整體體系的穩定。基於此，Mačák（2017）主張，各國應重新投入具法律拘束力之規範建構，以確保網路治理的合法性與持久性。

儘管現有關於全球數位治理的研究，已充分揭示缺乏強制性國際規範與統一監管架構所帶來的挑戰，然而相較之下，較少文獻深入探討如何從價值整合、共識建構與規範調節的層面，推動跨區域合作與長期治理架構的發展。現有研究多著眼於國家間治理與監管模式的差異，聚焦於「分歧」與「競爭」，卻較少關注如何橋接差異、提升制度吸引力與正當性的潛在機制。此一視角的不足，使得數位治理的規範發展脈絡難以被全面理解，亦低估了非強權行為者（如歐盟）在彌合治理分歧、推動多邊合作架構中的潛在角色與規範影響力。

二、數位主權作為數位治理的基本理念與價值框架²

數位治理的核心價值與共識建立，可從「數位主權」的討論作為切入點。隨著網路規範與治理日趨複雜，地緣政治情勢亦不斷升溫，各國愈加關注如何強化對自身數位基礎設施與資料的自主權與控制力，使數位主權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顧振豪 2021; Pohle and Thiel 2020）。

從歷史演變來看，數位主權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2000年代初期，其在數位領域的核心意涵與傳統的國家主權概念相似，象徵國家對自身數位空間擁有治理與控管的正當權威（Couture and Toupin 2019; Glasze et al. 2023）。除了作為抽象的主權理念，數位主權也逐漸具備可操作的制度實踐意涵。正如Karlstad

² 「數位主權」著重於個人、組織或國家對其數位資源（如資料、技術、平台、基礎設施）所擁有的自主權與控制權，常見於歐盟等民主國家的討論；相較之下，「網路主權」則指國家對其境內網路空間的全面治理權，包括資訊流通、內容審查與網路安全等，較多出現在強調國家控制的政體，如中國與俄羅斯。儘管兩者有所區別，但在應用上仍經常被交替使用。

（2023, 3）所指，數位主權是「國家如何規範並行使對其境內科技技術與服務的控制。這涉及數據安全的保障，同時讓企業、組織和個人能夠擁有更大的自主權，以管理自身的數位資產與數據」。概括而言，數位主權指的是國家在高度互聯的網路時代，為維護其自主性與安全性，所展現出的對數位基礎設施、數據資料以及相關政策框架的掌控能力與規範意圖（Couture and Toupin 2019）。隨著數位主權逐漸成為全球政策與治理關注的核心，其發展已不再僅止於制度層面的定義與操作性描述，也日益受到國際政治與經濟力量的深度影響。數位主權的確立，往往受到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因素的推動，因此其所蘊含的規範性主張也因應各方脈絡而趨於多元且錯綜複雜（Glasze et al. 2023; Pohle and Thiel 2020）。這些主張涵蓋對國家控制、個人資料保護、數位市場開放、技術自主與網路安全等議題的不同價值取向，反映出數位治理領域中多重的制度想像。尤有甚者，儘管數位主權概念在威權與民主體制中皆受到重視，其內涵與實踐方式卻也因政治制度、利益結構、社會脈絡與文化背景等差異而發展出各具特色的路徑與邏輯（Falkner, Heidebrecht, Obendiek, and Seidl 2024; Pohle and Thiel 2020）。

Musoni、Karkare、Teevan與Domingo（2023）進一步針對數位主權的實踐層面進行探討，指出其落實涉及對三個關鍵層面的掌控：其一為物理層，包括數位基礎設施與技術設備；其二為程式碼層，涵蓋技術標準、演算法設計與治理規範；其三則為數據層，涉及數據的所有權、流通方式與使用規則。這三個層面共同構成數位主權的核心結構，並直接影響國家在數位空間中的自主程度。此外，驅動各國推動數位主權的動機亦多元而不盡相同，主要包括：保障個人資料隱私、提升本國科技與產業競爭力，以及維護民主價值或實現國家戰略利益等，例如，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控制與在地化部署，便常被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由於各國在面對數位主權議題時，其戰略取向與優先考量各異，因此數位主權難以被視為一套單一且固定的概念，而更應被理解為一種多元、情境化且動態調整的政治實踐框架。

從全球治理的角度觀之，數位主權的實踐亦引發各種治理模式之間的競合與對立，進而加劇前述的全球數位秩序碎片化現象。各國對數位主權的願景與

優先目標存在分歧，使得數位治理體系呈現出日益多元且競爭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數位主權不僅牽涉國家對治理權限的主張，更深刻體現在其如何理解並導引數位轉型的方向與內涵。也因此，數位主權往往成為連結治理實踐與技術轉型之間的關鍵節點。正如 Glasze et al. (2023) 所言，數位轉型並非單純的技術現代化，而是深受地緣政治、規範性價值與戰略目標牽動。然而，現有討論多著重於數位主權的定義差異或操作分歧，較少觸及其背後的規則制定與價值主導權問題。Carr (2015, 642) 指出，全球網路治理中的「規則制定者」與「規則接受者」皆運作於特定的政治理念與規範假設之下，形塑了人們對國際網路「應然運作」的理解。換言之，數位主權的核心不僅是「誰擁有數據與技術」，更在於「誰能制定規則、輸出價值，決定數位秩序的運行邏輯並建構具正當性的治理體系」，從而影響未來治理模式的選擇與正當性。這一面向關涉軟硬權力與正當性，卻在現有研究中相對被忽視。簡言之，數位主權的論述與競逐，實則反映了國際間對規則設定與價值輸出的結構性爭奪。

三、數位秩序：美國市場驅動模式與中國國家主導模式

在數位主權與網路規範的概念逐漸深化為具體治理實踐的同時，國際社會對「數位秩序」的關注也日益升高。承接上述，數位秩序不僅涉及技術標準與資料治理規則的建構，更牽涉國家如何透過制度輸出與價值倡議，塑造全球網路空間的規則基礎與權力架構。在此脈絡下，美中之間日益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被視為推動數位秩序分化的關鍵動力。兩國分別透過政策、技術與規範輸出建構具體的治理模式，使數位空間呈現出日益兩極化的制度格局，也對其他國家的制度選擇與參與空間產生深遠影響。美國主張市場驅動的自由主義模式，而中國則推動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國家主導模式（Gao 2022; He 2023; Lantis and Bloomberg 2018; 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 Shen 2016; van 2018）。美中的兩種模式不僅反映出更廣泛的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競爭，也影響了各地對數位主權的理解與網路治理的實踐方式。

首先，身為全球網路治理理念的早期倡導者之一，美國自詡為「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Multi-Stakeholder Model）的擁護者（Kiggins 2015），主張市場導向的自由主義路徑，強調開放、互聯與資訊自由流動的網路環境，認

為這是促進數位經濟、技術創新、保障數位權利與維持網路全球性的關鍵基礎（Carr 2015; Denardis 2013; Degterev, Ramich, and Piskunov 2021; Lantis and Bloomberg 2018; 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作為最具代表性的網路治理模式之一，「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主張將數位治理權力分散至企業與非政府組織，透過去中心化的機制維持治理彈性與多方參與（Carr 2015; Degterev, Ramich, and Piskunov 2021; Kleinwächter 2007; Pohle and Thiel 2020）。

雖然美國持續倡導以開放為核心的治理模式，其在國際場域中的作為並非總是積極推動制度變革。Lantis和Bloomberg（2018）指出，美國在維護現有治理架構方面展現出高度的堅持，特別是在面對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家提出以「網路主權」為核心的替代性治理模式時，³往往採取防禦性立場，致力於遏止新制度的發展空間。

然而，美國模式本身亦面臨諸多批評。首先，美國在聯邦層級缺乏統一且具約束力的資料保護法規，加之大型科技企業於市場中佔據主導地位，助長了監控資本主義的擴張，並引發對個人隱私與資料濫用的廣泛憂慮（Aho and Duffield 2020; DiPersio 2022; Kwet 2019; 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再者，Carr（2015）批判指出，美國主導了全球網路治理的敘事，使得其所倡導的「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非但未能挑戰既有權力結構，反而鞏固了美國政府及其盟友的制度優勢。儘管該模式強調多元參與與治理開放性，但公民社會在實踐上多僅具象徵性角色，缺乏實質影響力，其參與功能更多用以強化制度的正當性，而非推動實質治理改革（Carr 2015）。與此同時，美國的跨國科技企業則在全球網路治理中發揮關鍵作用，不僅成為私部門主導的核心行為者，也實質強化了美國在網路治理制度設計上的影響力。正因如此，

³ 根據Budnitsky and Jia（2018）的研究，自1998年起，俄羅斯與中國即致力於推動「網路主權」（Internet Sovereignty）的論述，作為對美國所主張「網路自由」觀點的制衡策略。此概念不僅反映兩方在數位政策上的立場，也被視為一種國家形象打造（nation branding）的實踐手段，目的是在國際社會中強化其作為全球強權的身份認同與政治地位。因此，本文中所使用的「網路主權」一詞，主要聚焦於中國脈絡，指涉其在數位領域與網路空間中關於「主權」的相關論述與實踐。關於「網路主權」與「數位主權」的差異，請參閱註解2。

Carr (2015) 說明,「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雖具有強烈的規範訴求,但其主導性結構可能排除其他治理觀點與制度創新空間,進而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再製新的不對稱權力關係。

相較之下,中國主張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數位治理模式,強調對數位基礎設施、資料流通與網路空間的主權管控,藉以因應跨境資訊流動對國家安全與政治穩定構成的潛在風險(Gao 2022; He 2023; Shen 2016; Degterev, Ramich, and Piskunov 2021)。該模式提倡「基於網路主權的多邊多元主義」(multilateral pluralism based on internet sovereignty)(Cai 2018, 647),主張各國應擁有制度選擇與政策決策的主權空間,並由政府治理與監管過程中發揮主導功能(Degterev, Ramich, and Piskunov 2021; Hong and Harwit 2020; 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此模式不僅體現出治理主體的集中性,也彰顯中國對既有治理秩序提出另闢制度路徑的企圖。在對外論述上,「尊重網路主權」已成為中國參與全球網路治理的核心原則與話語基礎(Cary 2023)。例如,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莊榮文(2018)於《求是》發表文章指出,中國在推動對外開放的同時,堅持維護網路主權與國家安全。習近平亦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明確主張,各國應享有選擇自身網路治理模式的權利,並反對干涉他國內政或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網路行動(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此治理願景亦與中國整體戰略目標相契合,強調強化對國內數位環境的掌控,將網路治理與國家安全、政治穩定結合為一體作為優先考量(Gao 2022; McKune and Ahmed 2018)。透過將「網路主權」置於全球數位治理的核心位置,中國試圖為其國內監管措施賦予正當性,並積極塑造其作為「主權導向」治理模式的倡議者角色。此外,中國強化對數位平台與資訊內容的監管,將其納入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法規與政策體系中,以確保資訊傳播與平台運作符合國家政策目標與意識形態框架(Creemers 2020; Hong and Goodnight 2019; McKune and Ahmed 2018)。儘管此模式強調國家的主導地位,卻如Zhao (2010)與Shen (2016)所指出,中國治理實踐亦受到國內企業利益與全球產業鏈布局的影響,中央與企業間的互動在數位監管與經濟發展之間形塑出相互牽制的權力動態。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模式不僅塑造國內數位政策,也逐漸對他國產生示

範效應。儘管該模式因限制言論自由與強化國家監控而備受質疑（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對於重視國家安全與政權穩定的國家而言，仍具有一定吸引力（Gao 2022）。隨著中國積極推動數位基礎建設與治理合作，其模式的外溢效應日益顯著，不僅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參考，更促使部分西方國家重新檢視其監管策略，以因應愈加複雜的國安與社會治理挑戰（Adee 2019; Chang 2023; Gao 2022; Gong and Li 2019）。總體而言，在兩種模式的相互競逐下，美國對「自由—創新」的強調，以及中國對「主權—安全」的優先排序，構成全球數位治理中的核心張力，也進一步深化了制度路徑的分歧。⁴

儘管美中對立持續主導全球網路治理的主要論述，且其競爭對數位秩序與政策演變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然而，若僅將全球數位治理簡化為美國「自由市場」模式與中國「國家控制」模式之間的二元對立，將難以掌握當前治理格局所呈現的多層次動態與制度間的交織演變。事實上，治理場域並非由美中單方主導，其他重要行為者亦積極參與規範的塑造與制度的協商，其中以歐盟尤具

⁴ 不可否認，數位領域的發展本身即是一個高度複雜且持續演變的動態過程。美國的數位治理亦由傳統的市場導向，逐步轉向更強調國家安全與技術自主。自 COVID-19 疫情、俄烏戰爭與晶片供應危機以來，「數位韌性」與「永續性」成為美國數位政策核心指導原則。無論是川普政府提出的「乾淨網路」（The Clean Network）倡議，或拜登政府藉《晶片與科學法案》（*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推動關鍵技術在地生產、打造可信供應鏈並降低外部依賴，以落實去風險化（de-risking）政策；再到 2022 年 10 月主導「晶片四方聯盟」（Chips 4 Alliance），以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戰略構想凝聚理念相近的產業與國家；以及 2023 年 8 月發布行政命令，啟動對外投資審查機制等（Benson and Sicilia 2023），上述舉措皆以地緣政治、國家安全、經濟利益與意識形態為核心考量，並以價值與制度相容性為基礎，強化與民主盟友的數位合作，同時邊緣化中國的數位技術與平台。美國遂以制度化方式劃定「可信任」（trusted）與「不可信任」（untrusted）的數位邊界，以確保其數位自主、安全、韌性與永續發展得以落實（Fidler 202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The White House 2024a; The White House 2024b）。此一趨勢顯示，美國雖仍標舉自由開放，然其數位治理已朝向在安全考量下區分盟友與對手的規範結構轉型；儘管如此，美中在數位治理的核心價值與規範理念上仍分屬兩種迥異的治理典範與陣營取向。

簡言之，在二元對立加劇之際，數位治理中的「自由」與「安全」張力持續演變，也使歐盟角色的特殊性更加凸顯：它並非試圖取代兩強或成為對抗性的第三極，而是透過規範調和、價值倡議與制度對話，提出超越陣營對立的制度選項，體現其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的潛力。

代表性。歐盟不應被視為美中競爭的被動接受者，而是一個具備自主政策目標與行動能力的規範性角色。本文正是基於此，試圖回應現有研究對歐盟角色關注不足的問題，進一步超越美中二元對立的討論框架，重新定位歐盟在全球數位治理中的地位與影響，並探討其規範性行動如何推動更具包容性與多元性的治理秩序。

四、歐盟作為全球（數位）治理中的規範性權力

「歐盟規範性權力」（Normative Power Europe, NPE）概念自Manners（2002）提出以來，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引發廣泛關注。相關研究不僅探討其作為分析工具的理論意涵，也從批判性視角檢視其在歐盟多項對外政策實踐中的應用與限制（Kavalski 2013; Manners 2013; Veebel and Markus 2019; Jenichen 2022; Boulos Abad-Quintanal, Mayo-Cubero, and Ferreira 2023; Newman and Stefan 2020）。

該理論主張，歐盟的對外影響力並非建立在傳統以軍事與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定義之上，而是透過倡導民主、人權與法治等核心價值，形塑國際規範與行為準則。從此視角出發，歐盟的對外規範行動並非臨時性的政策選擇，而是根植於其制度架構與集體認同之中，反映出其一貫的價值導向（Manners 2002; Sjursen 2006）——和平、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等價值，不僅構成歐盟對內治理的核心基礎，也奠定其對外政策的規範性架構；這些價值透過外交實踐與制度性安排向外擴散，逐步塑造國際社會對於治理模式與規範秩序的期待與理解（Manners 2006; Tocci 2008）。作為一項理論視角，NPE已成為理解歐盟對外關係的重要分析框架，凸顯其在全球規範建構中的關鍵角色（Pollack 2016; Sicurelli 2016; Whitman 2013）。同時，該概念也標誌著國際權力邏輯的轉變——從以國家為中心的現實主義，轉向強調倫理治理與價值導向的影響力（Jenichen 2022; Manners 2008）。

然而，NPE理論在學術界亦面臨不少質疑與反思。部分學者指出，「規範性權力」概念內含道德優越的假設，傾向將「他者」視為有待啟蒙或文明化的對象（Diez 2005; 2013; Merlingen 2007; Pace 2007）。此外，隨著歐盟歷經多輪的擴張，內部的價值與利益日益多元與分歧，進一步挑戰其作為單一價值

體系代表的正當性（Newman and Stefan 2020）。這種內部所蘊含的矛盾，體現在歐洲民粹主義與威權政治勢力的崛起（Andguladze 2021; Lipps and Jacob 2024; Kapidžić 2020），以及歐盟在對外政策實踐上，部分成員國將國家利益凌駕於共同價值之上，削弱了歐盟作為規範輸出行為者的正當性與協調能力（Hyde-Price 2006）。

再者，學者亦指出歐盟在規範性論述與實際政策行動之間經常出現落差，導致「言行不一」的批評（Langan 2012; Sjursen 2006）。Sjursen（2006）因此質疑，歐盟是否真正具備「促進全球善治的權力」這一角色定位，至今仍缺乏明確判準。此外，由於歐盟在各政策領域中的規範擴散能力仍存在明顯差異，使其國際影響力在穩定性與可預測性上面臨挑戰（Chen 2021）。

從實體到數位的影響：

過去，歐盟的規範性權力主要體現在實體領域國際規範的塑造，例如環境保護、貿易規則與人權機制。然而，隨著數位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數位空間逐漸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場域，學界亦開始關注歐盟如何透過制度建構強化其在數位領域（資料保護、網路安全與數位權利等）的規範性權力，參與全球規範的發展（Chen and Yang 2022; Bradford 2023; Farrand and Carrapico 2022; Mantelero, Vaciago, Esposito, and Monte 2020）。

為回應數位平台治理、資料保護與市場公平性等新興挑戰，歐盟近年陸續推出具制度性意涵的立法，包括《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數位市場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 DMA）與《數位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 DSA）。相關研究指出，這些法規不僅提升了歐盟內部對科技平台的監管能力，也對全球數位企業的營運模式與法律遵循產生深遠影響；透過這些法案，歐盟逐步塑造其作為全球數位標準制定者的角色，並展現其作為獨立監管行為者的能動性與國際影響力（Labadie and Legner 2022; Maria and Reichert 2024）。從學理觀點來看，Bradford（2023）主張，歐盟正試圖以規範性手段回應全球數位治理中「制度真空」與「治理碎片化」的困境。在美中科技競爭升溫、全球對治理原則缺乏共識的背景下，歐盟藉由行使其規範性權力，積極介入數位治理場域，以確保

自身在新興數位秩序重塑過程中的話語權與主導地位。

在此脈絡下，歐盟作為規範性權力的角色，也延伸至對印太地區的數位參與。2021年，歐盟發布《印太合作戰略》，將數位夥伴關係列為優先合作領域，強調促進創新、保障數據隱私與深化網路安全合作的訴求（European Commission 2021）。透過區域倡議與價值導向的數位政策輸出，歐盟試圖將其「以人為本」的數位治理模式擴展至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空間，進一步強化其在全球數位秩序中的規範性影響力（Grgić 2023; Okano-Heijmans and Vosse 2020）。

然而，部分研究指出，歐盟的監管標準在跨境適用性與實質執行力方面仍有侷限，特別是在治理架構多樣、價值觀分歧、市場條件差異顯著，且深受地緣政治張力影響的印太地區，其規範擴散效力難以穩定落實（Broeders, Cristiano, and Kaminska 2023; Michalski and Parker 2024; Smith 2023）。更有批評指出，儘管歐盟主張價值導向，其規範輸出可能再度導致全球治理中的權力不對稱，且邊緣化其他非西方的治理模式，削弱其規範性權力的包容性與正當性（Bachmann and Moisio 2024）。

總之，在分析歐盟規範性角色時，多數文獻受限於二分式的論述框架：一方面，強調歐盟作為有影響力的規範輸出者、國際監管權力與標準制定者，認為其具有與美中相抗衡的潛力，能在全球數位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Bradford 2023; Okano-Heijmans and Vosse 2021）；另一方面，則指出歐盟受到內部制度性掣肘（Säär and Rull 2015; Sjørusen 2006）與外部地緣政治壓力（Králiková 2021; Langan 2012）所限制，使其在治理中呈現出更保守、被動的姿態，缺乏主動塑造國際規範的能動性。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討論規範行為者的文獻中，學界仍傾向以「規範開創者」（Norm Entrepreneur）與「規範反創者」（Norm Antipreneur）的二元劃分，作為界定行為者角色的典型分類。然而，這類二元框架過度簡化了歐盟在實踐中可能展現的策略靈活性與規範多樣性。

因此，本文主張應超越二分法，從更具動態性與多樣性的視角去理解歐盟的規範性行動。尤其在高度不確定的數位治理環境下，歐盟的角色不應僅限於「成功輸出者」或「被動接受者」，而應理解其如何透過規範調整、中介、

調和與互動等多元策略，主動回應外部變局並推動制度重構。基於上述文獻局限，本文嘗試提出新的分析途徑，主張從動態且多樣化的分析角度來理解歐盟在數位治理中的規範性權力運作。本文主張應聚焦於探討歐盟在多變的國際情勢下如何進行策略調整，以鞏固其作為規範行為者的能動性。為此，本文借鑒Paulus（2024）關於「規範能動性」（Normative Agency Framework）的理論框架，以補充並深化對NPE概念的理解。此一框架有助於分析歐盟如何在外部監管協調與內部戰略自主之間取得平衡，並藉由規範擴散，推動全球數位價值觀，影響國際數位秩序的發展方向。最終，本文希望藉由此一分析視角，重新檢視歐盟在數位治理中的規範角色，並對其能動性與戰略選擇提出更細緻的詮釋。這將有助於理解未來數位秩序的演變邏輯，並為數位主權與國際規範建構的相關辯論，提供新的啟發與思考方向。

參、理論框架：「規範能動性」與研究設計

一、規範的演變與「規範能動性」框架

本文首先借鑒Finnemore和Sikkink（1998）提出的「規範生命週期」（Norm Life Cycle）模型，以理解規範如何演變。該模型將規範的發展概念化為三個階段：

- （一）規範的興起（norm emergence）——由規範開創者（norm entrepreneurs）倡導並推動新規範的建立；
- （二）規範的擴散（norm cascade）——規範獲得更廣泛的接受，並被納入治理框架，進一步制度化；
- （三）規範的內化（norm internalization）——規範被國際社會廣泛採納，並成為理所當然的國際實踐（Finnemore and Sikkink 1998）。

該模型對於解釋全球規範的擴散具有重要作用，涵蓋人權、環境治理和民主問責等議題。然而，儘管「規範生命週期」能捕捉規範的結構性演變，卻傾向預設規範擴散沿單一路徑、循序而穩定地自動推進，因而招致批評（Bucher 2014; Krook and True 2012; Stimmer 2019）。Bucher（2014）指出，相關研究

常聚焦於規範的內在屬性，將其視為獨立於行為者的外在力量，過度強調機械式僵化的傳播過程，忽略社會互動與權力關係對規範採納與演變的影響。舉例而言，歐盟的數位治理策略並非僅沿著單一路徑推動規範擴散，而是涉及更複雜的戰略選擇與調整。

為回應上述局限，本文採納Paulus（2024）提出的「規範能動性」框架作為補充。該框架提供可操作的多元視角，用以分析行為者如何參與、調整、促進乃至抵制國際規範體系，並促使規範內涵與發展方向的演變。此框架與「規範性權力」概念密切相關：「規範性權力」著重行為者塑造國際規範結構的宏觀能力，「規範能動性」則揭示此種能力如何在具體脈絡中透過實踐得以展現、重構與轉化。兩者形成同時兼顧結構條件與實踐行動的多層次分析框架，有助於理解規範演變的複雜性。

在全球數位秩序日益兩極化的背景下，該框架對理解歐盟的角色尤具啟發。歐盟兼具制度守成者與規範創新者的雙重身分：一方面，在多數議題的主張上，歐盟與自由主義規範高度契合；另一方面，面對全球化與地緣政治重組之制度壓力，歐盟亦積極在數位治理上開拓自主路徑，倡議以人權、民主與透明為核心的「以人為本」治理模式。在此脈絡中，「規範能動性」有助於了解歐盟如何作為能動主體，依情勢靈活調整參與方式與角色定位，在堅持自身價值的同時，充當不同的角色，在不同規範間尋求平衡與折衷。

Paulus（2024）主張，行為者不僅是規範倡導者或被動接受者，還可能在不同階段與情境下，中介調節（mediate）、質疑（contest）或選擇性調適（selectively adapt）既存的規範。相較於將行為者簡化為「規範開創者」（Norm Entrepreneurs）與「規範反創者」（Norm Antipreneurs）的二分法，「規範能動性」框架強調行為者根據其所處的地緣政治背景與規範發展階段，展現出多樣化的行動策略與動態角色。其核心在於行為者如何接受、挑戰或重塑他者所提出之規範。

根據此框架，Paulus（2024）識別了行為者參與國際規範的六種不同方式（詳見圖1與表1）：

（一）規範反創者（norm antipreneurship）、現狀維護者（status quo defender）：積極抵制新規範的採納，試圖維護現有規範框架，防止影

響其戰略或意識形態利益的規範變革。

- (二) 規範開創者 (norm entrepreneurship)、修正主義者 (revisionist actor)：推動新的規範提案，以解決現有規範環境中的缺陷，並積極遊說其他行為者接受與採納。
- (三) 競爭性規範開創者 (rival norm entrepreneurship)：並非僅為維持現狀而拒絕新規範，而是試圖推動與之競爭的替代性規範框架，以符合自身利益。
- (四) 規範追隨者 (norm follower)：支持並促進已被接受或新興的規範擴散，但不主動發起或大力推動規範變革。
- (五) 規範被動參與者 (passive stance) (刻意或默認不參與)：有些行為者選擇不參與規範的辯論與制定，原因可能在於資源有限、戰略模糊策略或缺乏興趣而被動地置身事外。
- (六) 規範橋樑搭建者 (norm bridge-building) (調節者)：以調節與調和為手段，提出一條折衷的第三道路。橋樑角色包含兩層意涵：其一，透過制度橋接，在相互牴觸的數位治理模式間降低摩擦、轉釋差異並尋求共識，原則上不涉調停或仲裁；其二，納入過去在規範辯論中相對邊緣的利害關係人，擴大參與，促進更具包容、代表性的規範建構過程及治理架構（見圖2）。在吸納多元觀點的基礎上，規範橋樑者傾向提出相容性導向的銜接框架與共通規則，以降低體系張力、提升規範的可接受性與國際正當性，並在碎片化的全球治理中創造連結與制度交集，而非建立單一規範霸權，從而擴展對話與共識的規範空間。

此一框架明確採取「行為者導向」的視角，有別於過往部分文獻傾向將主體性抽象地賦予「規範本身」的分析路徑，而未充分關注行為者在其中所展現的具體策略與角色轉換。強調行為者如何在特定的政治脈絡中，透過溝通、倡議、抵制或提出替代規範，積極參與規範的塑造與「整合」，凸顯了價值對話在規範產生中的關鍵地位。這套分析工具的適用性在於觀察國家與其他國際行為者在規範競爭與塑造過程中的角色，並非僅專注於探討歐盟的對外規範性作用。

因此，與Bradford（2020）提出的「布魯塞爾效應」（Brussels Effect）相

比，「規範能動性」反映出不同的分析視角。「布魯塞爾效應」採取結構導向的視角，強調歐盟憑藉龐大市場與嚴格監管，使跨國企業基於合規壓力而被動採納歐盟規範，從而形成單向且自動化的外溢過程。這種模式凸顯的是規範影響的結果與制度擴張的規模，而非其生成機制。相較之下，「規範能動性」框架關注過程與參與，將規範視為多元行為者動態互動的產物。簡言之，「布魯塞爾效應」著重「規範如何外溢」，而「規範能動性」則強調「行為者如何參與規範的建構與競爭過程」。若前者體現歐盟作為規範出口者的結構性優勢，後者則提供一種較靈活、具情境敏感度的視角，說明歐盟如何在兩極化的數位規範環境中扮演中介或橋樑角色，透過策略性調節與倡議折衷方案，促進不同規範體系間的連結與整合。這一差異標誌著研究重心從「規範影響結果」轉向「規範建構過程」，並為重新理解歐盟在國際規範制定中的多重角色提供契機，跳脫「規範霸權」（Global Regulatory Hegemon）的侷限（Bradford 2020）。⁵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此框架並不假設行為者的能動性類型彼此排斥（Scott and Bloomfield 2017），亦不預設其互動必然是對立或零和。在特定情境下，不同行為者所代表的能動性可能互補，透過分工與協調形成規範建構中的動態聯盟。例如，「規範開創者」與「規範反創者」在目標上相互對立、彼此排斥，但「競爭性規範開創者」與「規範反創者」則可能在實踐中並存，展現更複雜的互動關係（Paulus 2024）。此外，此框架亦不將角色視為恆定不變，行為者會依地緣政治情境、議題特性與規範競爭格局等結構條件，在不同階段採取差異化的行動策略。行動類型的界定，除了取決於行為者的動機外，亦須考量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在規範發展過程中的中介功能（Paulus 2024; Risse and Sikkink 1999）。正因角色具有互動性、流動性與策略可轉換性，使此框架相較於傳統二元分類（norm entrepreneur versus norm

⁵ 在Bradford（2023）所著《數位帝國：全球科技監管之戰》（*Digital Empires: The Global Battle to Regulate Technology*）一書中，作者也是將歐盟定位為與美國與中國並列的主要競爭者，強調三大關鍵行為者如何透過數位科技推動「帝國式擴張」（The Expansion of Empires），並在數位權利、數位經濟與數位安全等領域，建構彼此競逐的監管體系，形塑出一場全球性的「帝國監管競爭」（Imperial Rivalries）。

antipreneur) 更具解釋彈性與動態適應力。

在此框架中，「規範橋樑者」的概念尤為關鍵。其立場介於規範開創者（推動治理變革）與規範反創者（維護現狀）之間，在高度兩極化的數位治理場域中，致力於在對立立場間尋求中間路徑，推動共識的可能性。此一協調並非被動妥協，而是基於戰略自主。若調節機制運作成功，則可能催生兼具雙方要素的混合治理模式，而非受制於激進修正或保守維持現狀的單一路徑。重要的是，規範橋樑者不僅調和不同規範體系間的張力，亦須理解並回應其他行為者的制度偏好與能力限制。⁶

借助「規範能動性」框架與「規範生命週期模型」，本文嘗試建構更靈活且動態的分析途徑，探討歐盟在數位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與參與方式。

圖1 國際規範互動的六種模式

參與國際規範的行為者類型



資料來源：改編自Paulus（2024），作者進一步概念化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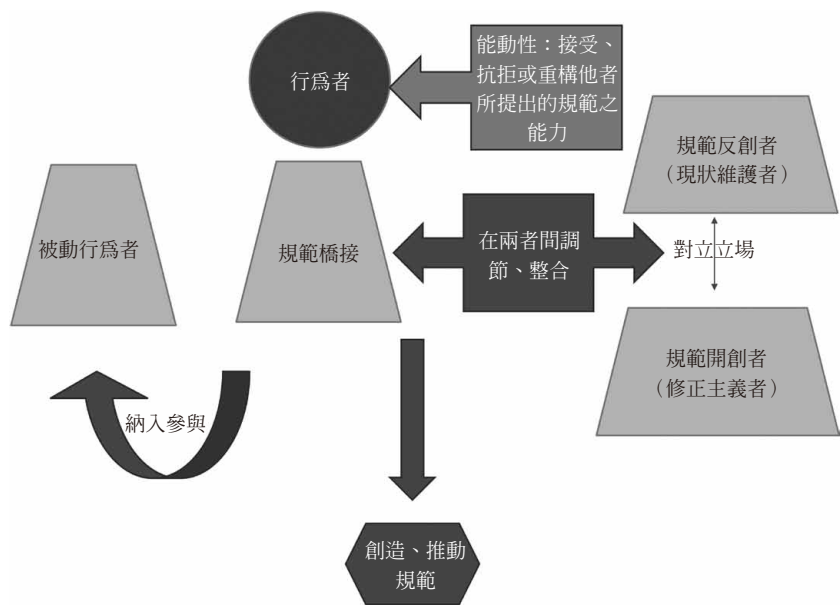
⁶ 必須強調的是，規範橋樑者能否成功促進共識並發揮其自主角色，仍取決於接收國的制度偏好、選擇空間與國內政治等多重因素。以印太地區為例，各國在發展程度、政治制度與數位基礎建設上差異顯著，因此對歐盟規範模式的反應亦呈現多樣性。這說明歐盟的規範輸出並非單向過程，而是必須透過互動與調適才能發揮作用。

表1 各類規範能動性類型之間的關係

規範角色類型	規範目標	行動策略	核心功能
1. 規範開創者	促進變革	自主提出新規範	挑戰現狀、引領創新
2. 規範反創者	抵制變革	捍衛現狀、否決倡議、反對新規範	維護現有規範
3. 競爭性規範開創者	推動另類變革	挑戰主流、另提替代方案、爭奪話語權	引導規範方向轉變
4. 規範追隨者	接受變革	支持他人提案、參與聯合行動	追隨主流倡議、協助新興提案擴散
5. 規範被動參與者	中立 / 不作爲	不參與、不表態、不回應	避免選邊
6. 規範橋樑搭建者	尋求整合、促進協作，並保持自主	調節分歧與動員其他行為者	納入規範被動參與者，促進共識建構，提升包容性、保持自主、提供中間立場

資料來源：改編自Paulus（2024），作者進一步概念化整理。

圖2 歐盟作為積極的行為者：規範橋樑搭建者



資料來源：改編自Paulus（2024），並由作者修訂。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取向，運用結構性文件分析與次級文獻檢閱，著重於政策框架、地緣政治動態與數位治理之規範層面，並透過多層次分析，探討歐盟在印太地區數位治理的角色與實踐，並揭示其在全球數位秩序塑造中的可能定位。

首先，本文主要依據歐盟的政策與監管文件進行結構性分析，主要涵蓋《數位服務法案》（DSA）、《數位市場法案》（DMA）與《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並輔以歐盟執委會的相關評估成果，如《2024數位十年現況報告》（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Digital Decade 2024）等。透過這些資料，本文旨在解析歐盟數位戰略的監管原則、核心價值與政策優先事項，進一步掌握其制度設計邏輯與戰略考量。其次，研究亦納入歐盟的政策聲明與戰略文本，例如2021年《歐盟印太合作戰略》及其與印太國家的雙邊協議，以評估其在區域數位治理合作中的角色與影響。

爲了補充文件分析，本研究亦參考次級資料，包括學術論文、智庫報告、專家分析及國際機構出版刊物，以掌握政策執行成效、監管機制影響力及數位治理框架發展的地緣政治脈絡。透過整合一手政策文件與二手分析材料，本文得以在制度層面與政治動態之間建立連結，並避免僅限於單一來源或官方論述的偏狹觀點。

此外，透過比較的分析方式，本文關注歐盟、美國、及中國等國家的數位治理模式在規範理念、價值導向與戰略考量的異同，以說明歐盟模式的獨特性，並揭示其規範性影響力與制度輸出在不同脈絡下的可行性與限制。

綜合政策文件與次級文獻的分析，本文試圖更全面且系統地掌握監管框架、規範演變、地緣政治動態與全球數位秩序趨勢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深化對歐盟在全球及印太數位治理中角色的理解。

三、理解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的兩個相互關聯面向

基於Paulus（2024）的「規範能動性」框架，本文將歐盟定位爲全球網路治理中的「規範橋樑」，其特徵顯現於能在競爭的監管範式與治理模式之間展

現整合調適能力。本文提出兩項基準進行分析：規範中介、調和（normative mediation）與數位外交下的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s through digital diplomacy）。

（一）規範中介：在兩極化格局中拓展制度互補與參與途徑

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其核心在於能否發揮中介調節的能力——在相互衝突的數位治理模式間化解分歧，並將多元價值與治理觀點整合成為可行的框架。不同於規範開創者推動變革，或規範反創者維護現狀，橋樑者透過積極調和，確保治理架構具包容性而非排他性。

衡量歐盟的中介作用可聚焦於兩點：

1. 是否促進監管一致性——歐盟提倡的方案是否能夠在對立的數位治理模式之間發揮對話機制，縮小價值分歧與監管落差。
2. 是否提出兼容並蓄具價值驅動的治理模式——歐盟是否能夠綜合不同監管範式的要素，提供符合數位權利價值觀，又兼顧安全與監管需求的治理框架。

衡量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的關鍵，在於其能否有效整合分歧、推動共識，以緩和數位治理的規範兩極化，並展現獨立自主的規範能動力。這樣的規範調節並非直接介入美中競爭，分別與雙方進行談判或仲裁，而是透過自身的規範能動力，提供一條折衷且具開放性的路徑，鞏固其在全球數位秩序中的影響力。

（二）戰略夥伴關係：透過數位外交擴展規範參與空間

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另一項關鍵在於能否運用數位外交與其他軟實力工具，建立具策略意涵的國際數位夥伴關係（digital partnerships），推動規範趨同。此角色不僅要求歐盟在地緣競爭中保持平衡，也需主動與尚未深入參與全球數位治理的國家互動，彌合治理模式落差，擴大規範的接觸面與接受度。

許多印太國家對美國的「市場驅動模式」與中國的「主權導向模式」均抱持保留的態度，更傾向尋求能兼顧發展、安全與權利的務實路徑。這些國家雖無力主導全球規範，但其選擇將深刻影響治理格局的未來走向。歐盟若能善用數位外交策略，透過雙邊合作與多邊倡議，與這些「規範被動參與者」建立對

話，分享規範經驗，則有助於共同塑造更具開放性與適應性的治理架構。

在此過程中，歐盟須強調協調與共創，而非單向輸出。透過政策交流、標準對接與能力建構，可推動全球規範逐步靠攏，並促使發展中與中等強國由「規範接受者」轉向積極的參與者；更重要的是，這些努力能確保規範框架立基於價值導向（value-based）的國際共識，而非權力壓制。

此外，透過數位夥伴關係的深化，歐盟亦得以強化自身作為規範中介者的定位，進一步鞏固以人權為核心基礎、具包容性與彈性的治理價值觀。同時，也有助於形塑其作為推動國際合作與維持制度穩定的全球行為者形象，拓展其「規範性權力」的實踐空間。

總結而言，歐盟若能透過策略性外交與制度合作，引導更多國家參與數位規範制定，將有助於強化其國際認同與長期影響。基於此，本文特別關注歐盟在印太地區促進數位合作的相關作為，藉此衡量其作為「規範橋樑」的實質作用。

肆、歐盟在印太數位秩序兩極化中的橋接作用

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在印太地區的數位參與

在印太地區快速數位轉型與美中對立加劇的背景下，歐盟並未以資源競逐或陣營劃分作為主要策略，而是強調以規範為基礎的參與方式。以下從「規範能動性」的分析視角，將歐盟定位為「規範橋樑搭建者」，著重探討其如何透過規範中介與戰略夥伴關係，在分歧中尋求合作與共識，進而在全球數位治理中開拓其影響空間。

一、在美中數位競爭間的規範中介：倡導整合與折衷之道

實證研究顯示，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的角色，主要體現在其能調整與適配規範，在相互競爭的治理模式之間尋求平衡，並推動「以人為本」與權利為核心的數位治理。因此，歐盟並非在美中之間扮演仲裁者，而是以不依附兩強的自主方案，於監管一致性與價值整合之間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規範框架。

相較於美國以市場為導向（market-driven）、強調企業自我監管與經濟自由的模式，或中國以國家主權為核心（sovereignty-based）、突出國家控制與網路安全的模式，歐盟採取的是一條折衷平衡的路徑，將數位權利、隱私保護與監管問責（regulatory accountability）結合，構築一種可因應不同數位環境的規範架構。這種調節與平衡的角色在三個關鍵領域尤為顯著：數據治理；數位經濟治理（包括網路平台內容治理）；網路安全框架。

在這些領域，歐盟不僅試圖縮小監管面向的分歧，也透過規範輸出與價值推廣，使其治理模式成為全球的重要參考，進一步強化其塑造全球數位規範的影響力。

（一）平衡隱私保護與跨境數據流動：GDPR作為全球數據治理的標準

歐盟在推動規範性影響方面，一個具代表性的案例是《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自2016年通過、2018年正式實施以來，GDPR已在全球塑造出新的規範認知框架，影響各國對數據資料及隱私保護的立法與實踐（Bennett, Chun, Adam, and Noveck 2018; Cate, Kuner, Millard, Lynskey, Svantesson, Lynskey, and Loideain 2017; Corning 2024）。首先，在比較層次上，美國與中國的數據治理模式展現出兩種極端路徑。美國傾向抵制全面性的隱私立法，主張維持數據自由流動（free data flows）、反對數據在地化（data localization），並以市場需求與企業利益作為政策核心，僅在必要時採取最低限度的監管（Gao 2021a）。此一市場驅動體系將數據視為推動創新、產業靈活性與全球科技競爭力的關鍵資產（Gao 2021a）。相較之下，中國則建立起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嚴格數據控管體系，透過《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等法規，限制數據跨境流動，並強化國家對數據基礎設施與數位平台的監管與掌控，將數據定位為國家治理與社會穩定的戰略資源（Gao 2021a; He 2023）。然而，此一路徑常以個人隱私為代價，在政府對個人數據享有高度存取與調用權的情況下，個人權益保障的空間顯著受限（He 2023）。在這兩種極端模式之間，歐盟的GDPR則展現一種「中間立場」。它一方面強化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權利，另一方面並未採取全面數據自由流動或數據在地化，而是在嚴格條件下允許數據跨境流動。這種規範化但具彈性的模式，凸顯了歐盟在隱私保護與數位開放性之間所追求的價值平衡（Gao 2021a; Ryngaert and

Taylor 2020; Voigt and Von dem Bussche 2017)。

此外，GDPR的域外影響並非對第三國的強制輸出，而是透過市場驅動的合規誘因與制度互認機制所產生的「外溢效應」：憑藉歐盟龐大的市場與其規範的正當性，GDPR逐步成為全球數據治理的重要參照。其中國家層次的「適足性認定」(adequacy agreements)與企業層次的「企業約束規則」(Binding Corporate Rules, BCRs)等機制，構成制度互認的關鍵管道以確保數據在隱私保護與流動性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為跨境資料傳輸提供必要保障，另一方面降低交易與合規成本，因而創造對接歐盟制度的誘因，並推動若干國家調整國內法制以趨近歐盟標準(Ryngaert and Taylor 2020; Greenleaf 2017; Kastlová 2024)。⁷

例如，日本自2018年GDPR生效後修訂《個人信息保護法》(APPI)，以達到等效標準，並於2019年與歐盟簽署《歐盟－日本數據適足性協議》，創建了「全球最大安全數據流通區域」，亦標誌著歐盟首次與第三國互相承認資料保護標準(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Nishi 2018)。新加坡則在其原有的《個人資料保護法》(PDPA)基礎上進行修法強化，以求在多項核心原則上與GDPR保持一致(如納入「事前同意」)，並積極研議納入「資料可攜權」與強化企業責任等相似措施，來回應歐盟的隱私保護精神(Tan and Azman 2019; DPEX 2022)。印度在2017年最高法院承認隱私為基本人權後，亦於2023年通過《數位個人資料保護法》(DPDPA)，其立法精神和制度設計在多方面與GDPR相呼應，標誌著其在數據隱私保護方面邁向更嚴格的標準(Greenleaf 2017; Sadoian 2024)。臺灣雖尚未獲得歐盟的適足性認定，但其《個人資料保護法》(PDPA)已經過多次修訂，特別在透明度、跨境數據資料傳輸與個人數據權利保障方面逐步接軌歐盟標準(Tseng and Huang 2024; Tseng, Huang, and Kai 2023)。這些案例顯示GDPR已從「歐洲內部規範」發展為「跨域的治理標竿」。

⁷ 不可否認，歐盟GDPR的實施與全球擴散已在學者間引發多元的討論。部分學者主張其擴張主要源於權力導向而非價值驅動策略(Gstrein and Zwitter 2021)。批評者進一步指出，GDPR的域外影響力需更審慎的規範，以避免潛在衝突或對第三國利益造成非預期負面衝擊(Kuner 2015; Svantesson 2013)。

除了單一國家層面，GDPR亦逐步影響區域組織的數據治理實踐與促進區域層級隱私保護標準的建構。受GDPR啟發，東協於2016年發布《東協個人資料保護框架》（ASEAN Framework on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並於2018年提出《東協數位數據治理框架》（ASEAN Framework on Digital Data Governance），旨在建構一套以原則為導向、具互通性的區域監管機制，以促進數位貿易與跨境數據流通（ASEAN 2021a; Okano-Heijmans, Chan, and Dekker 2022）。在跨境傳輸的規範設計上，文件明確主張兩項核心目標：一則促進區域內資料自由流動，二則確保跨境資料獲得適當且必要的保護（ASEAN 2021b, 5-6）。此種在「開放」與「保護」之間尋求平衡的數據治理取向，與歐盟的「中間立場」相契合。

儘管東協文件未明示「以人為本」的語彙，其強調的核心原則——同意（Consent）、告知與目的限制（Notification and Purpose）、資料正確性（Accuracy of Personal Data）、安全維護（Security Safeguards）、存取與更正權（Access and Correction）、跨境資料傳輸（Transfers to Another Country or Territory）、資料保存（Retention）與問責（Accountability）（ASEAN 2021b, 7）——已體現對個資及隱私權益的高度重視，並在相當程度上呼應歐盟以使用者權益為本的規範價值取向。

此外，《東協數位總體規劃2025》（ASEAN Digital Masterplan 2025）進一步推動與亞太經合會跨境隱私規則（CBPR）的銜接，並朝與GDPR之間的互通與接軌努力，以強化跨區域的規範兼容性與監管協調（ASEAN 2021a）。

總體而言，GDPR的全球影響力不僅來自其域外適用性，更在於把個人隱私、數據權利與監管問責制度化為治理的價值基礎。這些價值已逐漸轉化為跨國企業與國家主動對接的規範依據，同時也避免數據治理陷入「全面放任」與「嚴格控管」的二元對立。GDPR所體現的平衡立場與中介路徑，正是歐盟作為「規範橋樑」的最佳體現，顯示其在全球數位治理中，具有促成整合、推動共識與實現規範收斂的能動性。

1. 數位經濟治理：以用戶權益為核心的治理模式

除GDPR外，歐盟透過《數位市場法案》（DMA）與《數位服務法案》

（DSA）在數位經濟領域構築一套彼此銜接的監管架構，兼顧市場競爭、平台責任與基本權利，推動建立更公平且透明的數位市場環境，並以此展現其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的定位（Chiarella 2023;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Wagner, Eifert, Metzger, and Schweitzer 2021;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a）。其制度設計以「以人為本」、「權利導向」、公共性可持續等為原則，將可競爭性與公平性、透明與問責、用戶能動性等要求具體化為可對接、可調適的治理路徑。DMA聚焦競爭結構與行為矯正，以事前義務回應大型平台的系統性影響；DSA則聚焦內容治理與用戶權利，將透明、問責與救濟嵌入平台治理流程。此並行架構把競爭與權利內嵌於同一治理體系，旨在避免將數位市場治理侷限於單一面向，體現歐盟所重視的數位治理價值（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Wagner, Eifert, Metzger, and Schweitzer 2021）。

DMA針對所謂的「守門人」（Gatekeepers），亦即在數位生態系統中被歐盟認定為具有系統性影響力的大型科技企業和線上平台，要求其遵守事前義務以矯正可能的結構性失衡，包括：禁止自我優待、限制不當網綁與預設、強化互通與資料可攜、開放關鍵介面與資料存取、降低第三方進入障礙等（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a）。根據Eurasia Group（2018）報告指出，全球科技生態系統正日益分化為兩個具有政治驅動性的競爭陣營：中國的BATX（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小米）與西方的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這種分化加劇了科技壟斷和市場集中的問題，也引發了數位生態系統互通性不足和公平競爭受限的隱憂（Eurasia Group 2018）。DMA以「可競爭性」（Contestability）與「公平性」（Fairness）為規範目標，藉由明確、可預期的事前義務與歐盟層級的集中執法，抑制支配力濫用，同時為中小企業與新進者保留創新空間（European Parliament 2021）。歐盟主張的「市場公正」意在重構資訊與基礎設施的權力分配，遏止少數超大型平台藉由連結大量商業使用者與終端使用者的中介優勢，以及跨領域數據與服務的滾動效應，形成對整體平台生態的結構性支配與鎖定，進而削弱創新空間與競爭動能。「可競爭性」的價值，在於維護多元路徑與市場的可進入性，讓中小型創新者在不落入不對稱劣勢的前提下與既有業者競逐（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a)。

DSA將線上平台視為承載公共溝通與商務活動的核心樞紐，要求（超）大型平台／搜尋引擎進行系統性風險評估（含非法內容、公共討論操弄、基本權利侵害、對未成年之風險、平台交易衍生的詐騙行為等），並建立風險緩解措施與外部稽核機制（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b;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b）。法案要求線上平台／搜尋引擎強化廣告與演算法運作的透明度、可解釋與可監督的推薦系統、研究者資料存取、通知—申訴—救濟流程，以及關閉個人化推薦等用戶控制選項，以保障用戶的知情權和選擇權（Strowel and De Meyere 2023;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Pop, Bezemer, and Grant 2022;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b;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b）。透過將程序性保障與資訊自決嵌入平台治理，DSA在「言論自由」與「風險減緩、管理」之間建立可操作的制度平衡，使平台治理不再仰賴單方自律或事後補救，亦非經由內容封堵換取安全，而是落實於可稽查、可追責、可驗證的運作，藉此強化用戶的主動權（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b;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b）。

雖然美國和中國都已開始採取措施以應對大型科技公司的影響力（Colino 2021），而歐盟的做法仍在數位經濟治理格局中，提供了有別於美中模式的第三種選擇。美國的價值排序歷來以創新與言論自由為首位，主要依賴自願性行業標準，以維持市場驅動和自我調節的模式，聯邦干預有限，傾向把數位平台視為促進創新的私營領域與承載公共言論的中介場域，因而偏好事後矯正與司法救濟為主，缺乏統一的準則框架也僅讓平台負擔有限責任（Benson, Gaffney, Linebaugh, Trout, and Wild 2024; Brannon and Holmes 2024）。相對地，中國則以「秩序、安全與主權」為核心價值，強調平台作為國家治理與社會穩定的工具，偏好由國家主導的前置審管與內容管制路徑，對演算法推薦、深度合成與生成式AI等實施專門規則與管控機制，將平台納入更嚴密的內容與系統性風險控管（Xinhua News Agency 2022; Creemers 2015; Gao 2021a; 2021b; Zha and Dong 2022; Erie and Streinz 2021; 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

介於兩者之間，歐盟藉由DMA與DSA提出中介性的治理選項：既不把自由等同於放任，也不把安全等同於全面控制，而是在自由—保護、開放—韌性之間，以「可競爭性／公平性」與「透明／問責／用戶權利」為軸，試圖讓數位經濟在權利可主張、權力可追問、風險可治理的條件下運作。在此意義上，DMA與DSA不僅是歐盟內部法規，更是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於全球數位經濟治理中推動規範靠攏與合作對話的關鍵工具。

2. 網路安全與數位主權：在自由開放與安全保障之間的價值實踐

在面對地緣政治與技術風險交織升高的情勢下，歐盟不僅關注數據治理與數位經濟的規範設計，更進一步將「數位安全」與「數位主權」納入其整體治理戰略。其核心理念並非落於國家全面掌控或完全依賴市場，而是主張透過制度架構強化韌性，同時維護自由開放、信任與基本權利的數位秩序。

在全球數位治理格局中，不同主要行為者對「數位主權」的理解與定位存在明顯差異。美國在數位治理上未明確採用「數位主權」的概念，反映其偏向開放取向與自由化的策略取向。中國則強調國家主權同等適用於數位與實體領域，並積極倡導數位主權以加強國家管控。歐盟採取折衷路線，將數位主權視為保障個人隱私、資料保護與公民權益的框架，同時維護其在全球數位體系中的自主性，避免受到外部勢力如外國政府或跨國科技企業的過度影響。

歐盟近年來強調數位自主，將「網路安全」提升至「歐洲數位主權」（European Digital Sovereignty）的戰略核心層次，致力於減少對特定供應商的依賴，並提升整體資訊系統的抵禦能力（Carrapico and Farrand 2024）。透過如《網路安全法》（*Cybersecurity Act*）⁸、NIS2指令（*NIS2 Directive*）與《網路韌性法案》（*Cyber Resilience Act*）⁹等措施，歐盟強化對關鍵基礎設施、數

⁸ 該法案有兩項核心功能：1. 擴大歐盟網路與資訊安全局（ENISA）的職權，強化其對成員國政策協調與事件應變能力；2. 建立適用各類ICT產品、服務與流程的歐盟網路安全認證框架（Wahl 2019）。

⁹ NIS2於2022年通過，要求關鍵與重要產業強化風險管理、事件通報與供應鏈安全，旨在提升整體網路韌性，促進成員國資安規範的一致性與合作，各國須於2024年10月17日前完成國內法化（European Commission 2025a）；而《網路韌性法案》預計2027年適用，是規範所有含數位元件產品的資安要求，強調產品在設計、開發與整個生命週期中的預設安全性與漏洞管理機制（European Commission 2025b）。

位產品與數位服務的安全規範，並建立跨成員國的一致標準與安全認證機制（Wahl 2019;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a）。特別是網路安全認證框架（EU-wide Cybersecurity Certification Framework）的推出，不僅降低產業遵循成本，也提升使用者對日常數位產品的信任程度，進一步強化單一市場整體的數位韌性（Wahl 2019）。

與此同時，歐盟並未因強化安全而犧牲開放與創新，而是採取風險導向的中介策略。其代表性做法為《5G工具箱》（5G Toolbox）：不同於美國對特定供應商傾向採取全面禁制，亦有別於中國的高度前置控管，在否定採取「完全開放或完全排除」的二元選擇下，歐盟以更細微的做法，透過風險分級、供應商信賴評估，配合技術與政策組合建議，提供成員國可調適且可比對的指引，以便對高風險供應商採取相應措施（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Oxford Analytica 2020; Gao 2022）。¹⁰此一靈活安排兼顧數位主權、產業開放與安全需求，避免單一治理邏輯主導，並彰顯歐盟作為全球網路安全規範中介者的協調與創新能力。

相比之下，美國以自由市場與創新推動為核心，資安政策主要依賴「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然而，其標準制定與風險管理高度分散，缺乏整合與全面性的法律基礎，也因此引發產業界與學界呼籲建立更具一致性的標準與監管機制（Salminen and Campbell 2025; Brooks 2019; Dix 2025; O'Mara and O'Neill 2025）。例如，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下的「網路安全暨基礎設施安全局」（The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CISA）為強化資訊分享、風險監測與應變能力，建構一套產官協作體系，強調非政府行為者（如企業、NGO、專業組織等）在資安治理中的積極參與（Salminen and Campbell 2025）。

¹⁰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近期對高風險供應商的態度確有收緊趨勢，執委會持續敦促各成員國加速落實對「高風險供應商」的限制。然而，截至目前，相關限制尚未具有強制法律效力，實際執行仍由各國自主決定。此發展並不必然否定文中主張的歐盟中介策略，而是反映出其在維持數位主權與確保安全之間，持續調整政策平衡的動態過程，顯示其試圖在兩強之間走出一條中間路線的考量。

中國則延續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治理邏輯，透過《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等法規，將資安治理納入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強化政府對基礎設施與數據等數位資產的監督與審查權限，凸顯數位治理與社會穩定、政治控制的深度交織，展現「國家主導型」的特徵（Gao 2021a; Perez 2022; Erie and Streinz 2021; He 2023）。然而，這些法規雖以國家安全為導向建立數據分類制度，卻因相關定義模糊而使實質解釋權由政府當局掌握（Perez 2022）。例如，《數據安全法》將數據劃分為「國家核心數據」與「重要數據」，並對其施加嚴格管制，但並未明確規範義務是否僅限於「關鍵資訊基礎設施運營者」，或亦涵蓋一般數據處理者。考量其與國安高度相關，其限制可能外溢至更廣泛的行為主體（甚至個人），進一步引發外界對法規任意解釋與執法不透明的疑慮（Gao 2021a; Perez 2022）。

歐盟的網路安全治理策略，則在兩極之間，開闢出一條中介路徑，以避免單一治理邏輯過度主導：既不放任私部門主導，也不將國家安全視為唯一優先，而是透過風險治理、用戶信任與市場創新之間的制度調和，兼顧數位主權、產業開放與安全需求，推動「安全與自由並重」的治理理念。這一治理理念也延伸至《人工智慧法案》（*AI Act*）等新興科技領域。作為全球首部依據風險等級規範AI應用的立法，它一方面回應社會挑戰、人權與倫理風險，另一方面試圖在鼓勵創新與強化監管之間取得平衡，建立有效而不過度干預的法規架構（European Commission 2024c）。簡言之，歐盟的數位規範不僅是一套法規框架，更是一種價值觀的輸出，體現其對「以人為本、透明可問責、權力可受控」的數位秩序想像。儘管各項法規的影響力有所差異，透過與GDPR、DMA、DSA相互呼應的政策網絡，歐盟試圖建構出一套兼顧安全、主權與基本權利的數位治理模式，在市場驅動與國家控制治理範式間取得平衡。在規範擴散與制度協調的推動下（Finnemore and Sikkink 1998），結合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與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的影響，歐盟的全球數位規範橋樑地位將得到進一步鞏固（Arthur 1989; Pierson 2000; Bradford 2023）。

（二）戰略夥伴關係：以數位外交擴展規範生態，吸納周邊行為者

在推動戰略夥伴關係與深化數位外交影響力方面，歐盟積極參與雙邊與多邊數位協議，以宣揚自身價值觀、促進規範趨同，並界定共通原則與邊界，

影響不同治理模式的對接方式。根據2021年《歐盟印太合作戰略》，數位治理與夥伴關係已被確立為歐盟在該地區的重要支柱（European Commission 2021）。簡而言之，歐盟以三個面向推動印太數位夥伴關係：其一，運用的工具—以數位夥伴關係協定（Digital Partnership Agreements, DPA）作為一種軟性的規範治理機制，透過對話、協調、標準化與互通性安排，在政策層面擴散其規範傾向、促進制度的趨同，以降低跨境制度所可能產生的摩擦（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2023; 2024d; European Parliament Research Service 2025; Bradford 2020）。除了此類協定外，歐盟還結合「聯合聲明」、「合作備忘錄」等其他軟法工具以及透過法律接軌、合格評定／認證機制等，強化規範相容性與在地治理框架的可對接性（European Commission n.d.;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e; European Commission 2025c; 2025d; Blenkinsop 2024; EEAS 2022b; Bradford 2015; European Parliament Research Service 2025）。其二，合作的對象—採價值導向原則，以民主治理、法治、人權與數據隱私保護為核心，優先與理念相近、志同道合的夥伴深化合作，在互信架構下推進重點領域的協作（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EEAS 2022a;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b; European Commission 2025d;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2023）。¹¹其三，支援的配套—透過長期援助、能力建設（如Digital ODA、Cyber4Dev）及共同研究等不同的合作計劃，強化合作國之制度吸收能力、促進人才交流與培訓，以完善資安治理與風險管理機制，縮短數位治理的落差，提升歐盟政策執行與監管落地的能力（D4D Hub n.d.; Cyber4Dev 2023; European Parliament Research Service 2025;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e）。

在此基礎上，2022年「印太合作部長級論壇」（Ministerial Forum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強調支持歐盟分別與日本、新加坡及南韓推進數位夥伴關係之制度化合作進程，推動「以人為本」取向的合作基調建立可信的數位社會（EEAS 2022a; EEAS 2022b;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b; Ministry

¹¹ 歐盟亦與一些「非志同道合」的國家展開合作。但此類合作形式，在名稱、範圍及架構上均有別於數位夥伴關係。例如，與中國的合作屬臨時性合作安排，透過「數位對話」機制，簽署了線上產品安全等領域的行動計畫（European Parliament Research Service 2025）。

of Trade and Industry 2023)。同時，歐盟亦宣布計劃在印太設立「數位發展中心」(Digital 4 Development Hub)，作為區域性的協調平台，以支援包容且可持續的數位轉型(EEAS 2022a)。

除了透過數位夥伴關係推動區域合作，歐盟亦積極與印太國家(包括澳洲、葛摩、印度、日本、模里西斯、紐西蘭、南韓、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菲律賓等)共同發表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s)(EEAS 2022b)。這些聲明一致將個人隱私與個人資料保護界定為「核心價值與基本自由」，並指出「共同願景是採取以人為本的方式進行數位轉型，不僅有效保護個人資料在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並且是促進跨境合作的重要推動力」(EEAS 2022b)。此一立場與GDPR之精神相契合，等同於將GDPR的語彙與原則外溢為對外關係的共同語言，強化歐盟在「可信資料自由流通」(Data Free Low with Trust)與全球隱私治理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與主導性(EEAS 2022a; 2022b)。換言之，歐盟透過數位外交與軟實力的協同運作，以規範輸出與標準設定形塑國際數位秩序的方向與界線。

此外，歐盟的數位外交策略亦涵蓋針對發展中國家所推動的「網路韌性計畫」(Cyber Resilience for Development, Cyber4Dev)，隸屬於歐盟的數位發展援助(Digital ODA)框架，旨在提升合作夥伴國的網路韌性，並推動以「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的數位治理模式，強調回歸到「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提倡符合法治與良善治理的原則，以促進區域合作，建立開放、自由、安全且具韌性的數位環境(Cyber4Dev 2023; Okano-Heijmans and Vosse 2020)。

在美中科技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歐盟的數位外交策略對發展中國家在數位治理模式的選擇愈發關鍵。與科技巨頭市場主導或國家機器強勢干預不同，歐盟以其規範橋樑整合的角色，藉由數位外交深化共享價值規範，確保數位轉型兼顧民主原則、監管平衡與自主主權(Okano-Heijmans and Vosse 2020; Renard 2018)。這種策略凸顯歐盟作為規範橋樑的另一面向：它並非被動受制於大國競爭框架，而是在強權與較弱小國家之間發揮中介與平衡功能。透過對話、協商、援助方案、研究計畫與跨區域合作等，歐盟得以塑造並推廣自身的數位規範與價值，而不僅僅依賴法律規範的直接適用。由此，一方面強化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價值同盟，另一方面引導數位治理在普世價值的座標上穩健

前行，建立一個開放、自由、受保障、以人爲本且可信賴的數位環境（EEAS 2022a）。

伍、結論：展望未來，反思歐盟面臨的挑戰與限制

本文肯定歐盟在印太數位治理中扮演「規範橋樑者」的潛力，但其能否轉化爲實質影響，仍取決於多項現實條件：一、內部能力與執行；二、接收方的主體性與在地條件；三、兩極化結構下的權力與資源約束。

首先，內部能力與執行是規範能見度轉化爲實效的前提。歐盟規範影響力的可持續性，取決於其內部在技術創新、產業能量與制度整合上的基礎實力（Gerrits 2009; 陳馨蕙、葉國俊 2022）。若缺乏自主技術與產業鏈支撐，縱有成熟的治理理念與輸出機制，其規範輸出恐將流於象徵。Landau（2025）亦指出，價值導向的數位治理若與經濟或技術現實脫節，易造成政策與需求的落差並引發反彈，削弱其規範性權力的正當性與吸引力。從產業層面觀之，新興數位規範與監管迫使企業重整營運與合規架構，以維持競爭力（Wheeler 2024）。誠然，法規一致性具重要性；然企業端更關切實務操作成本與創新彈性。尤其中小企業與新創公司，因承載能力較弱，易受制度設計與過度監管之直接衝擊。以臺灣爲例，實證研究顯示，歐盟之規範與政策思維（如數據治理、隱私與數位主權的理念）雖引起科技、製造業之關注與若干回應，惟相較臺灣及美中在供應鏈與經貿的深度連結，歐盟在政策採納層面的實質影響仍相對有限，顯示其在技術動能與產業支撐不足的結構性挑戰仍待克服（陳馨蕙、葉國俊 2022）。

其次，接收方的主體性與在地條件決定了歐盟在印太地區推動數位規範的成效。實際上，印太區域各國對歐盟治理模式的接受程度無法概括而論，各國的反應，涵蓋支持、觀望乃至保留甚至批評。¹²區域內各國因國內制度條件、發展階段與政策優先順序不同，對歐盟倡議之回應呈現高度異質性

¹² 礙於篇幅與研究焦點所限，本文未能詳述印太各國的策略差異與在地考量，惟此面向將作爲後續研究的重要方向，以進一步探討地方主體性對規範傳播與落地成效之影響。

(Nouwens, Maremonti, Togashi, and Brandt 2023; Bentotaheewa, Hewage, and Willams 2022)。例如，日本與南韓，因與歐盟共享人權、民主等自由主義核心價值，對歐盟推動的資料保護、人工智慧倫理等規範表達認同與支持，並已透過「雙邊數位夥伴關係」深化合作（European Commission 2025d;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f）。相較之下，印尼、馬來西亞等發展中經濟體多採審慎觀望與調適，雖認同數據治理的重要性，但多強調法規應配合其數位主權的考量與在地經濟的需求進行調整（ANTARA Indonesian News Agency 2025; Rana and Azeez 2025; Chakravarti 2024）。印度雖在個資保護法規上逐步與GDPR靠攏，但對歐盟治理模式仍持批評立場，指出其設計過於嚴格，未能顧及南方國家的發展需求與制度多樣性（Radic 2024; Pangotra 2024）。這些差異顯示，歐盟的規範輸出是否有效，除仰賴其橋接能力，更繫於接收國的選擇空間、制度偏好與協商意願，唯有結合節奏管理、議題分段與能力建構，方能轉為穩健的在地化落實。

最後，兩極化結構下的權力與資源約束，壓縮了歐盟的中介橋樑空間。在美中競逐加劇與印太監管在地化需求上升之際（Corning 2024），歐盟在安全承諾、產業誘因與技術生態等籌碼上相對不足，因而處於不對稱的競爭場域；同時，如上述，其自主性亦受內部政治協調與對外經貿依賴的牽制。「布魯塞爾效應」固然提供規範外溢的結構條件（Bradford 2020），但在亞洲市場常遭遇美中雙重影響的稀釋。在此情勢下，歐盟即便試圖以規範工具維持影響力，其政策輸出往往需與美國的安全安排或中國的市場規模綑綁協調，降低了規範單獨發揮槓桿的能力。再者，印太國家多採取務實的「多邊對沖」（hedging）與議題分組合作（minilateralism）（Kuik 2022; Koga 2022），使得歐盟多扮演輔助性角色或專項合作夥伴，而非議程設定者。

基於上述的條件與約束，以下提出綜合結論與政策意涵。

綜合而論，歐盟在數位規範領域的影響不應僅被視為一個單向的擴散過程，而是一場持續的制度協商。若要強化其「規範橋樑者」效能，關鍵在於：縮小「規範—能力落差」（透過研發與產業政策，提升競爭力，支撐歐盟的規範輸出）、以夥伴共構回應在地需求（將規範調適為因地制宜、可落地的政策方案），並採資源供給、技術合作與能力建構結合規範倡議，提升物質誘因與

可持續性。如此，歐盟才能在兩極化格局中，把「價值主張」具體化為可被對接的制度選項，並將「規範橋接」轉化為可持續的區域影響。

展望未來，歐盟以「規範橋樑」的角色推動數位治理，最可能出現的情形是「選擇性的部分趨同」與「分段式的對接」：各方會先在隱私、透明與問責等基本原則上形成共識，但在落實強度與操作細節上仍將各自為政。這樣的治理格局雖有助於避免全球數位秩序被完全二分，但隨著美中競爭加劇、規範陣營化加深的發展，歐盟的折衷路徑亦可能面臨邊緣化風險。部分國家或許願意在原則層面接受歐盟倡議，但在涉及安全、產業利益或政治聯盟時，仍可能被迫向美國或中國靠攏，使歐盟的橋樑角色陷入「原則認同—實踐分歧」的窘境。

未來研究可從三個方向拓展：首先，檢視歐盟在全球數位治理中角色的演進與互動，特別是在規範塑造過程中其策略與定位如何隨地緣政治變化而調整；其次，比較歐盟在不同地區扮演「規範橋樑」角色的異同，包括其政策輸出策略與在地落實情況的差異，進而探討歐盟如何透過與區域組織合作來強化其數位規範的外部影響力與制度滲透力；最後，深入分析個別印太國家對歐盟規範輸入的條件、接受度與回應邏輯，進行比較研究，檢視地方主體性對規範傳播與落地成效之影響。

綜言之，在全球數位秩序逐步碎片化的趨勢下，歐盟的「規範能動參與」展現出其調節整合潛力。即便不具壓倒性的經濟與技術優勢，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歐盟所能提供的，是一種超越陣營對立、兼顧價值與現實考量的互動場域。這並不意味其具備制衡美中兩強的硬實力，而是在規範協調與制度對話層面，為印太區域行為者創造更多選項與凝聚共識的可能，有助於緩解各國在美中競爭壓力下所面臨的政策兩難。因此，歐盟的規範角色及其戰略價值，不應僅以「影響力大小」或「規範擴散速度與範圍」來衡量，而更應關注其在兩極數位治理模式之間，維持自主、提供制度折衷與對話空間的能力——這種介於價值堅持與務實調適之間的定位，或將成為當前與未來數位秩序重構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收件：114年2月22日，接受：114年9月16日）

“Bridging” Digital Divides: The EU’s Role in Indo-Pacific Digital Governance

Yung-Yung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PhD. Program in Asia-Pacific Regional Stud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an era of rapi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the digital domain has become a core battleground for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reshaping global governance, security,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The intensifying U.S.-China technological rivalry is accelerat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global digital order, with the key challenge being the divergence in global cyber governance norms, reflecting conflicting values and policy prioriti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ith its economic potenti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arena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governance.

Beyond U.S.-China competition, the European Union (EU), as a Normative Power, also seeks to exert influence over the digital order in the Indo-Pacific.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U.S.’s market-driven approach and China’s state-led model in digital governance, the EU’s role remains ambiguous, necessitating further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e and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 this domai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U’s normative influence in data governance,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ybersecurity, exploring how it seeks to maintain strategic autonomy amid U.S.-China competition. Drawing on Paulus (2024)’s Normative Agency framework, this research evaluates the EU’s approaches and pathways of influence in digital governance. Through policy document analysis,

academ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EU's normative impact in shaping digital order.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EU primarily acts as a “Norm Bridge-Builder”, attempting to mediate between the polarized U.S. and Chinese digital governance models, offering a middle-ground approach and inclusive pathway that promotes cross-border data flows,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human-centric digit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EU's influence in the Indo-Pacific remains constrained by factors such as internal policy coherenc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city, the pressures of intensified U.S.-China competition, and the strategic calculations of regional states.

Structurally,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global digital governance and the EU's normative role, followed b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It then presents case studies on the EU's engagement in the Indo-Pacific and conclude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EU faces in shaping the digital order, offering insights for the EU's future digital strategy.

Keywords: European Union, Digital Governance, U.S.-China Rivalry, Indo-Pacific Strategy, Normative Power

參考文獻

- 莊榮文，2018，〈科學認識網路傳播規律 努力提高用網治網水平〉，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8-09/16/c_1123429145.htm，查閱時間：2024/10/10。
- Chuang, Rong-wen. 2018. “Kexue renshi wanglu chuanbo guilu nuli tigao yongwang zhiwang shuiping” [Gain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terns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Strive to Enhance the Ability to Govern the Internet Effectively]. (Accessed on December 18, 2024).
- 陳馨蕙、葉國俊，2022，〈供應鏈變遷下歐盟經貿政策對臺歐產業交流的影響：我國上市櫃興櫃公司問卷調查分析〉，《政治學報》，74：37-64。
- Chen, Shin-hui and Yeh, Kuo-chun. 2022. “Gongyinglian bianqian xia oumeng jingmao zhengce dui taiou chanye jiaoliu de yingxiang: woguo shangshigui xinggui gongsi wenjuan diaocha fenxi” [The Impact of the EU’s Economic Policies on the Taiwan-Europe Industrial Exchanges under Global Supply Chain Transition: A Questionnaire for Enterprises in Taiwan Stock Exchang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 37-64. DOI: [http://doi.org/10.6229/CPSR.202212_\(74\).0002](http://doi.org/10.6229/CPSR.202212_(74).0002)
- 顧振豪，2021，〈數位主權與跨境資料流動之衝突〉，https://web.wtcenter.org.tw/Page/126/364953#_ftn5，查閱時間：2024/11/20。
- Gu, Zhen-hao. 2021. “Shuwei zhuquan yu kuajing ziliao liudong zhi chongtu” [The Conflict between Digital Sovereignty and Cross-Border Data Flows]. (Accessed on November 20, 2024).
- Adee, Sally. 2019. “The Global Internet is Disintegrating. What Comes Next?” *BBC*. <https://www.bbc.com/future/article/20190514-the-global-internet-is-disintegrating-what-comes-next> (May 15, 2019).
- Aho, Brett and Duffield, Roberta. 2020. “Beyond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rivacy, Regulation and Big Data in Europe and China.” *Economy and Society*, 49: 187-212. DOI: <http://doi.org/10.1080/03085147.2019.1690275>
- Andguladze, Ama. 2021. “‘Anti-liberal Europe’, an Opposing Narrative to

- Normative Power Europe in the Eastern Neighbourhood? The Case of Georgia.”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4 (1): 77-95. DOI: <https://doi.org/10.1080/23745118.2021.1956240>
- ANTARA Indonesian News Agency. 2025. “Indonesia Studies EU’s Digital Regulations for Governance Framework.” <https://en.antaranews.com/news/353173/indonesia-studies-eus-digital-regulations-for-governance-framework> (April 28, 2025).
- Arthur, W. Brian. 1989.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99 (394): 116-131. DOI: <https://doi.org/10.2307/2234208>
- ASEAN. 2021a. “ASEAN Digital Masterplan 2025.”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ASEAN-Digital-Masterplan-EDITED.pdf> (January 08, 2025).
- ASEAN. 2021b. “ASEA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nisters Meeting (TELMIN) Framework on Digital Data Governance.”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2/05/6B-ASEAN-Framework-on-Digital-Data-Governance_Endorsedv1.pdf (January 08, 2025).
- Bachmann, Velt and Moio, Sami. 2024. “An Inquiry into the EU’s Role in Global Domination: Thinking Normative Power through the Frankfurt School.”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60 (3): 440-459. DOI: <http://doi.org/10.1177/00108367241244966>
- Bennett, Colin. J., Chun, Soon-ae, Adam, Nabil. R., and Noveck, Beth Simone. 2018. “The European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n Instrument for the Globalization of Privacy Standards?” *Information Polity*, 23 (2): 239-246. DOI: <http://doi.org/10.3233/IP-180002>
- Benson, Emily and Sicilia, Gloria. 2023. “A Closer Look at De-risking.” *CSI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loser-look-de-risking#:~:text=The%20concept%20of%20de%2Drisking%20was%20first%20introduced,2023%20and%20quickly%20adopted%20by%20U.S.%20officials> (December 20, 2023).

- Benson, Peter J., Gaffney, Jonathan M., Linebaugh, Chris D., Trout, Matthew D., and Wild, Clay. 2024. "The American Privacy Rights Act (CRS Legal Sidebar No. LSB11161)."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LSB11161> (May 16, 2025).
- Bentotahewa, Vibhushinie, Hewage, Chaminda, and Williams, Jason. 2022. "The Normative Power of the GDPR: A Case Study of Data Protection Laws of South Asian Countries." *SN Computer Science*, 3: 183. DOI: 10.1007/s42979-022-01079-z
- Blenkinsop, Philip. 2024. "EU and Singapore Agree Digital Trade Deal."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eu-singapore-agree-digital-trade-deal-2024-07-25/> (July 25, 2024).
- Boulos, Sonia, Abad-Quintanal, Gracia, Mayo-Cubero, Marcos, and Susana Ferreira. 2023. "Construction of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Human Rights Narratives in Spanish Media Discourses on the European Union." *El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ón*, 32 (4): 1-17. DOI: 10.3145/epi.2023.jul.07
- Bradford, Anu. 2015. "The Brussels Effec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07 (1): 1-68.
- Bradford, Anu. 2020. *The Brussels Effect: How the European Union Rules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0088583.001.0001>
- Bradford, Anu. 2023. *Digital Empires: The Global Battle to Regulate Techn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7649268.001.0001>
- Brannon, Valerie C. and Holmes, Eric N. 2024. "Section 230: An Overview (CRS Report No. R46751)."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R46751> (April 1, 2024).
- Broeders, Dennis, Cristiano, Fabio, and Kaminska, Monica. 2023. "In Search of Digital Sovereignty and Strategic Autonomy: Normative Power Europe to the

- Test of Its Geopolitical Ambition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61 (5): 1261-1280. DOI: <https://doi.org/10.1111/jcms.13462>
- Brooks, Chuck. 2019.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The Cybersecurity Challenge of Protecting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cognitiveworld/2019/05/06/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and-the-cybersecurity-challenge-of-protecting-critical-infrastructure/> (October 16, 2024).
- Bucher, Bernd. 2014. “Acting Abstractions: Metaphors,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the Eclipse of Agenc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 (3): 742- 765. DOI: <https://doi.org/10.1177/1354066113503481>
- Budnitsky, Stanislav and Jia, Lianrui. 2018. “Branding Internet Sovereignty: Digital Media and the Chinese-Russian Cyberalli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5): 594-613. DOI: <https://doi.org/10.1177/1367549417751151>
- Cai, Cuihong. 2018. “China and Global Cyber Governance: Main Principles and Debates.” *Asian Perspective*, 42 (4): 647-662. DOI: <https://doi.org/10.1353/apr.2018.0029>
- Carr, Madeline. 2015. “Power Plays in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3 (2): 640-659. DOI: <https://doi.org/10.1177/0305829814562655>
- Carrapico, Helena and Farrand, Benjamin. 2024. “Cybersecurity Trends in the European Union: Regulatory Mercantilism and the Digitalisation of Geopolitic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62 (S1): 147-158. DOI: <https://doi.org/10.1111/jcms.13654>
- Cary, Dakota. 2023. “Community Watch: China’s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community-watch-chinas-vision-for-the-future-of-the-internet/> (November 08, 2024).
- Cate, Fred H., Christopher Kuner, Christopher Millard, Orla Lynskey, Dan Jerker, B. Svantesson, and Nora Ni Loideain. 2017. “The GDPR as a Chance to Break Down Borders.”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7 (4): 231-232. <https://doi.org/10.1007/s40305-017-0171-1>

org/10.1093/idpl/idx023

- Chakravarti, Jayant. 2024. "Malaysia's Data Sovereignty Rules Drive Tech Investments." <https://www.bankinfosecurity.asia/malaysias-data-sovereignty-rules-drive-tech-investments-a-25364> (January 11, 2025).
- Chang, Yung-yung. 2023. "China beyond China, Establishing a Digital Ord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Growing Discursive Power and the Digital Silk Road." *Politics & Policy*, 51 (2): 283-321. DOI: <https://doi.org/10.1111/polp.12524>
- Chen, Xue-chen. 2021. "Unpacking Normative Power Europe: EU Promotion of Security Norm Cluster in ASEAN." *European Security*, 31 (2): 262-288. DOI: <https://doi.org/10.1080/09662839.2021.1997994>
- Chen, Xue-chen and Yang, Yi-fan. 2022. "Different Shades of Norms: Comparing the Approaches of the EU and ASEAN to Cyber Governanc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57 (3): 48-65. DOI: <https://doi.org/10.1080/03932729.2022.2066841>
- Chiarella, Maria Luisa. 2023. "Digital Markets Act (DMA) and Digital Services Act (DSA): New Rules for the EU Digital Environment." *Athens Journal of Law*, 9 (1): 33-58. DOI: <https://doi.org/10.30958/ajl.9-1-2>
- Colino, Sandra Marco. 2021. "Towards a Global Big Tech Clampdow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773151 (December 12, 2024).
- Corning, Gregory P.. 2024. "The Diffusion of Data Privacy Laws in Southeast Asia: Learning and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EU's GDPR." *Contemporary Politics*, 30 (5): 656-677. DOI: <https://doi.org/10.1080/13569775.2024.2310220>
- Couture, Stephane and Toupin, Sophie. 2019. "What does the Notion of 'Sovereignty' Mean when Referring to the Digital?" *New Media & Society*, 21 (10): 2305-2322. DOI: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65984>
- Creemers, Rogier. 2015. "The Pivot in Chinese Cybergovernance. Integrating Internet Control in Xi Jinping's China." *China Perspectives*, 4: 5-13. DOI: <https://doi.org/10.4000/chinaperspectives.6835>

- Creemers, Rogier. 2020. "China's Conception of Cyber Sovereignty: Rhetoric and Realization." In Dennis Broeders and Berg B. van den, eds., *Governing Cyberspace. Behavior, Power, and Diplomacy*, pp. 107-142.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Cyber4Dev. 2023. "Cyber Resilience for Development (Cyber4Dev, project fund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Project Objectives." <https://staging.cyber4dev.eu/project-activities/> (January 12, 2025).
- D4D Hub. (n.d.). "About the D4D Hub." <https://d4dhub.eu/who-we-are> (June 2, 2025).
- Degtarev, Denis, Ramich, Mirzet, and Piskunov, Danil. 2021. "U.S. & China Approaches to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New Bipolarity' in Terms of 'The Network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Research Journal*, 16 (3): 7-33. DOI: <https://doi.org/10.17323/1996-7845-2021-03-01>
- Denardis, Laura. 2013. "Multi-Stakeholderism: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Challenge to Democrac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34 (4): 40-44.
- Diez, Thomas. 2005. "Constructing the Self and Changing Others: Reconsidering 'Normative Power Europ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3 (3): 613-636. DOI: <https://doi.org/10.1177/03058298050330031701>
- Diez, Thomas. 2013. "Normative Power as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8 (2): 194-210. DOI: <https://doi.org/10.1177/0010836713485387>
- DiPersio, Denise. 2022. "Data Protection, Privacy and US Regulation." <https://aclanthology.org/2022.legal-1.3.pdf> (January 12, 2025).
- Dix, Robert B.. 2025. "PERSPECTIVE: Revitalizing America's Cybersecurity-A Call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and National Standards." *Homeland Security Today US*. <https://www.hstoday.us/featured/perspective-revitalizing-americas-cybersecurity-a-call-for-public-private-partnership-and-national-standards/> (June 15, 2025).
- DPEX. 2022. "Why the EU GDPR Shapes Data Protection Practices in Asia." *Data Protection Excellence Network*. <https://www.dpexnetwork.org/articles/why->

- europes-gdpr-affects-data-protection-practices-asia# (June 2, 2025).
- EEAS. 2022a. “Ministerial Forum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ministerial-forum-cooperation-indo-pacific_en (September 27, 2024).
- EEAS. 2022b. “Joint Declaration on Privacy and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joint-declaration-privacy-and-protection-personal-data_en (November 28, 2024).
- Erie, Matthew S. and Streinz, Thomas. 2021. “The Beijing Effect: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as Transnational Data Governance.”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54 (1): 1-92.
- Euraisa Group. 2018. “Eurasia Group White Paper: The Geopolitics of 5G.” [https://www.eurasiagroup.net/siteFiles/Media/files/1811-14%205G%20special%20report%20public\(1\).pdf](https://www.eurasiagroup.net/siteFiles/Media/files/1811-14%205G%20special%20report%20public(1).pdf) (Decemebtr 20, 2024).
- European Commission. (n.d.). “Adequacy Decisions.” https://commission.europa.eu/law/law-topic/data-protection/international-dimension-data-protection/adequacy-decisions_en (June 15, 2025).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European Commission Adopts Adequacy Decision on Japan, Creating the World’s Largest Area of Safe Data Flows.”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9_421 (October 15, 2024).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Cybersecurity of 5G Networks- EU Toolbox of Risk Mitigating Measures.”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cybersecurity-5g-networks-eu-toolbox-risk-mitigating-measures> (October 15, 2024).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jointcommunication_2021_24_1_en.pdf (October 15, 2024).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a.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n Horizontal Cybersecurity Requirements for Products With Digital Elements and

- Amending Regulation 2019/102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22PC0454> (December 20, 2024).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b. “European Union- Republic of Korea Digital Partnership.” <https://ec.europa.eu/newsroom/dae/redirection/document/91875> (June 15, 2025).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EU-Singapore Digital Partnership.”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eu-singapore-digital-partnership> (June 15, 2025).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a.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Package.”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digital-services-act-package> (December 20, 2024).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b.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QANDA_20_2348 (January 15, 2025).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c.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Digital Decade 2024.”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report-state-digital-decade-2024> (February 6, 2025).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d.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Digital Partnership Council.”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joint-statement-second-meeting-european-union-japan-digital-partnership-council> (March 18, 2025).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e. “EU-Japan Memorandum of Cooperation on Digital Identities and Trust Services to Implement 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eu-japan-memorandum-cooperation-digital-identities-and-trust-services-implement-data-free-flow> (June 15, 2025).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f. “EU and Republic of Korea Reaffirm their Partnership for an Inclusive and Resili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4_1708 (March 18, 2025).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5a. “NIS2 Directive: Securing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 Systems.”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nis2-directive> (July 15, 2025).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5b. “Cyber Resilience Act.”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cyber-resilience-act> (April 15, 2025).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5c. “Joint Communication on an International Digital Strategy for the EU.”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joint-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digital-strategy-eu> (June 15, 2025).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5d.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Digital Partnership Council.”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joint-statement-third-meeting-european-union-japan-digital-partnership-council> (June 15, 2025).
-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EU Digital Markets Act and Digital Services Act Explained.”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opics/en/article/20211209STO19124/eu-digital-markets-act-and-digital-services-act-explained> (January 15, 2025).
-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a. “Regulation (EU) 2022/1925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4 September 2022 on Contestable and Fair Markets in the Digital Sector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EU) 2019/1937 and (EU) 2020/1828 (Digital Markets Act).”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265: 1-66. <https://eur-lex.europa.eu/eli/reg/2022/1925/oj>
-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b. “Regulation (EU) 2022/2065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9 October 2022 on a Single Market for Digital Services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0/31/EC (Digital Services Act).”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277: 1-102. <https://eur-lex.europa.eu/eli/reg/2022/2065/oj>
- European Parliament Research Service (EPRS). 2025. “The EU’s Digital Partnerships.” *At a Glance*.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ATAG/2025/772894/EPRS_ATA\(2025\)772894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ATAG/2025/772894/EPRS_ATA(2025)772894_EN.pdf) (July 10, 2025).

- Falkner, Gerda, Heidebrecht, Sebastian, Obendiek, Anke, and Seidl, Timo. 2024. "Digital Sovereignty- Rhetoric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31: 2099-2120. DOI: <https://doi.org/10.1080/13501763.2024.2358984>
- Farrand, Benjamin and Carrapico, Helena. 2022. "Digital Sovereignty and Taking Back Control: From Regulatory Capitalism to Regulatory Mercantilism in EU Cybersecurity." *European Security*, 31 (3): 435-453. DOI: <https://doi.org/10.1080/09662839.2022.2102896>
- Fidler, David P.. 2020. "The Clean Network Program: Digital Age Echoes of the 'Long Telegra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log/clean-network-program-digital-age-echoes-long-telegram> (December 20, 2024).
- Finnemore, Martha and Sikkink, Kathryn. 1998.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4): 887-917.
- Flonk, Danielle, Markus Jachtenfuchs, and Obendiek, Anke S.. 2020. "Authority Conflicts in Internet Governance: Liberals vs. Sovereignists?"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9 (2): 364-386. DOI: <https://doi.org/10.1017/S2045381720000167>
- Ford, Jolyon and Clifford, Damian. 2021. "Embracing Difference: Governance of Critical Technologies in the Indo-Pacific." <https://openresearch-repository.anu.edu.au/bitstream/1885/227730/1/quad-tech-network-series-embracing-difference-governance-critical-technologies-indo-pacific.pdf> (December 6, 2024).
- Gao, Henry S.. 2021a. "Data Sovereignty and Trade Agreements: Three Digital Kingdoms." In Anupam Chander and Sun Haochen, eds., *Data Sovereignty: From the Digital Silk Road to the Return of the State*, pp. 213-2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7582794.003.0010>
- Gao, Henry S.. 2021b. "Data Regul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M. Burri, ed., *Big Data and Global Trade Law*, pp. 245-26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o, Xinchuchu. 2022. "An Attractive Alternative? China's Approach to Cyber Gover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Western Model."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57 (3): 15-30. DOI: <https://doi.org/10.1080/03932729.2022.2074710>
- Gerrits, A. (Ed.). 2009. "Normative Power Europe in a Changing World: A Discussion (Clingendael European Papers No. 5)." https://www.clingendael.org/sites/default/files/pdfs/20091200_cesp_paper_gerrits.pdf (December 18, 2024).
- Glasze, Georg, Cattaruzza, A., Douzet, F., Dammann, F., Bertran, M., Bômont, C. et al. 2023. "Contested Spatialities of Digital Sovereignty." *Geopolitics*, 28 (2): 919-958. DOI: <https://doi.org/10.1080/14650045.2022.2050070>
- Gong, Sen and Li, Bing-qin. 2019. "The Digital Silk Road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DS Bulletin*, 50 (4). DOI: 10.19088/1968-2019.137
- Greenleaf, Graham. 2017. "2014-2017 Update to Graham Greenleaf's Asian Data Privacy Laws- Trade and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s." *UNSW Law Research Paper No. 17-47*. DOI: <https://doi.org/10.2139/SSRN.3000766>
- Grgić, Gorana. 2023. "Ambition, Meet Reality: The European Union's Actorness in the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5 (5): 680-689. DOI: <https://doi.org/10.1177/01925121231191275>
- GSMA. 2021. "The Mobile Economy 2021." https://www.gsma.com/mobileeconomy/wp-content/uploads/2021/07/GSMA_MobileEconomy2021_3.pdf (December 11, 2024).
- Gstrein, Oskar J. and Zwitter, Andrej. 2021.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the GDPR: Promoting European Values or Power?" *Internet Policy Review*, 10 (3). DOI: <https://doi.org/10.14763/2021.3.1576>
- Haataja, Samuli. 2022. "Cyber Operations agains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under Norms of Responsible State Behaviour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0 (4): 423-443. DOI: <https://doi.org/10.1093/ijlit/eaad006>
- Hansel, Mischa. 2023. "Great Power Narratives on the Challenges of Cyber Norm

- Building.” *Policy Design and Practice*, 6 (2): 182-197. DOI: <https://doi.org/10.1080/25741292.2023.2175995>
- He, Kai and Li, Ming-jiang. 2020.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the Indo-Pacific: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Regional Actors,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96 (1): 1-7. DOI: <https://doi.org/10.1093/ia/iiz242>
- He, Alex. 2023. “State-Centric Data Governance in China.” <https://www.cigionline.org/static/documents/no.282.pdf> (October 6, 2024).
- Hong, Yu and Goodnight, G. Thomas. 2019. “How to Think about Cyber Sovereignty: The Case of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 (1): 8-26. DOI: <https://doi.org/10.1080/17544750.2019.1687536>
- Hong Yu and Harwit, Eric. 2020. “China’s Globalizing Internet: History, Power, and Governanc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 (1): 1-7. DOI: <https://doi.org/10.1080/17544750.2020.1722903>
- Hu, Wei-xing. 2020.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Rise and Return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hina Review*, 20 (3): 127-142.
- Hyde-Price, Adrian. 2006.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Realist Critiqu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3 (2): 217-234. DOI: <https://doi.org/10.1080/13501760500451634>
- Jenichen, Anne. 2022. “The Politics of Normative Power Europe: Norm Entrepreneurs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Making of EU External Human Rights Polic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60 (5): 1299-1315. DOI: <https://doi.org/10.1111/jcms.13157>
- Kapidžić, Damir. 2020. “The Rise of Illiberal Politics in Southeast Europe.”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20 (1): 1-17. DOI: <https://doi.org/10.1080/14683857.2020.1709701>
- Karlstad, W.. 2023. “Digital Sovereignty: Adapting to a Challenging Digital Landscape.” <https://www.tietoevrytechservices.com/siteassets/03-files/whitepapers/tech-services-digital-sovereignty-whitepaper-v1-2023.pdf> (November 20, 2024).

- Kastlová, Helena. 2024. "Report on Extraterritorial Enforcement of GDPR." https://www.edpb.europa.eu/system/files/2024-10/edpb_20240417_report_extraterritorial_enforcement_gdpr_en.pdf (October 18, 2024).
- Katagiri, Nori. 2021. "Why International Law and Norms Do Little in Preventing Non-State Cyber Attacks." *Journal of Cybersecurity*, 7 (1): 1-9. DOI: <https://doi.org/10.1093/cybsec/tyab009>
- Kavalski, Emilian. 2013.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of Normative Pow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nd Normative Power China in Contex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8 (2): 247-267. DOI: <https://doi.org/10.1177/0010836713485386>
- Kharlamov, Alexander and Pogrebna, Ganna. 2019. "Using Human Values Based Approach to Understand Cross Cultural Commitment toward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of Cybersecurity." *Regulation & Governance*, 15 (3): 709-724. DOI: <https://doi.org/10.1111/rego.12281>
- Kiggins, Ryan David. 2015. "Open for Expansion: US Policy and the Purpose for the Interne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16 (1): 86-105. DOI: <https://doi.org/10.1111/INSP.12032>
- Kleinwächter Wolfgang. 2007. "The Power of Ideas: Internet Governance in a Global Multi-Stakeholder Environment." <https://images.arataacademy.com/seiiti-arata-online-learning-page-90.pdf> (September 27, 2024).
- Kliem, Frederick. 2021. "The EU Strategy on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A Meaningful Regional Complement?" https://www.kas.de/documents/288143/16920728/Panorama+2021_01+Kliem.pdf (September 30, 2024).
- Koga, Kei. 2022. "A New Strategic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Asia Policy*, 17 (4): 27-34. DOI: 10.1353/asp.2022.0063
- Králiková, Marta. 2021. "Importing EU Norms: The Case of Anti-Corruption Reform in Ukraine."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44 (2): 245-260. DOI: <https://doi.org/10.1080/07036337.2021.1872559>

- Krook, Mona L. and True, Jacqui. 2012. "Rethinking the Life Cycles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Global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 (1): 103-127. DOI: <https://doi.org/10.1177/1354066110380963>
- Kuik, Cheng-chwee. 2022. "Hedging via Institutions: ASEAN-led Multilateralism in the Age of the Indo-Pacific." *Asian Journal of Peacebuilding*, 10 (2): 355-386. DOI: 10.18588/202211.00a319
- Kuner, Christopher. 2015.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ata Transfers in EU Data Protection Law."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5 (4): 235-245. DOI: <https://doi.org/10.1093/IDPL/IPV019>
- Kwet, Michael. 2019. "Digital Colonialism: US Empire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Race & Class*, 60 (4): 3-26. DOI: <https://doi.org/10.1177/0306396818823172>
- Labadie, Clement and Legner, Christine. 2022. "Building Data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to Address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 Learnings from EU-GDPR."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8 (1): 16-44. DOI: <https://doi.org/10.1177/02683962221141456>
- Landau, Jean-Pierre. 2025. "Europe Found Its Values and Lost Its Way."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nsequences-of-eu-policy-based-on-high-level-principles-not-practical-considerations-by-jean-pierre-landau-2025-02> (July 4, 2025).
- Langan, Mark. 2012.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Africa-EU Ties: A Conceptual Reorientation of 'Normative Power'". *New Political Economy*, 17 (3): 243-270. DOI: <https://doi.org/10.1080/13563467.2011.562975>
- Lantis, Jeffrey S. and Bloomberg, Daniel. 2018. "Changing the Code? Norm Contestation and US Antipreneurism in Cyberspa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2 (2): 149-172. DOI: <https://doi.org/10.1177/0047117818763006>
- Lipps, Jana and Jacob, Marc S.. 2024. "Undermining Liberal International

- Organizations from within: Evidence from 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 357-383. DOI: <https://doi.org/10.1007/s11558-024-09559-y>
- Macák, Kubo. 2017. “From Cyber Norms to Cyber Rules: Re-engaging States as Law-makers.”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0 (4): 877-899. DOI: <https://doi.org/10.1017/S0922156517000358>
- Manners, Ian. 2002.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 (2): 235-258. DOI: <https://doi.org/10.1111/1468-5965.00353>
- Manners, Ian. 2006. “Normative Power Europe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3 (2): 182-199. DOI: <https://doi.org/10.1080/13501760500451600>
- Manners, Ian. 2008. “The Normative Eth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 (1): 45-60. DOI: <https://doi.org/10.1111/J.1468-2346.2008.00688.X>
- Manners, Ian. 2013. “Assessing the Decennial, Reassessing the Global: Understanding European Union Normative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8 (2): 304-329. DOI: <https://doi.org/10.1177/0010836713485389>
- Mantelero, Alessandro, Giuseppe Vacago, Maria Samantha Esposito, and Nicole Monte. 2020. “The Common EU Approach to Personal Data and Cybersecurity Reg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8 (4): 297-328. DOI: <https://doi.org/10.1093/ijlit/aaaa021>
- Maria Niestadt and Reichert, Jasmin. 2024. “The Global Reach of the EU’s Approach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4/757632/EPRS_BRI\(2024\)757632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4/757632/EPRS_BRI(2024)757632_EN.pdf) (January 8, 2025).
- Maurer, Tim. 2020. “A Dose of Realism: The Contestation and Politics of Cyber Norms.” *Hague Journal on the Rule of Law*, 12: 283-305. DOI: <https://doi.org/10.1007/s40803-019-00129-8>

- McKune, Sarah and Ahmed, Shazeda. 2018. "The Contestation and Shaping of Cyber Norms through China's Internet Sovereignty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3835-3855. <https://ijoc.org/index.php/ijoc/article/view/8540/2461> (January 8, 2025).
- Merlingen, Michael. 2007. "Everything Is Dangerous: A Critique of 'Normative Power Europe'." *Security Dialogue*, 38 (4): 435-453. DOI: <https://doi.org/10.1177/0967010607084995>
- Michalski, Anna and Parker, Charles F.. 2024. "The EU's Evolving Leadership Role in an Age of Geopolitics: Beyond Normative and Market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2): 263-280. DOI: <https://doi.org/10.1017/eis.2023.34>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Remarks by H.E. Xi Jinping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Second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https://www.mfa.gov.cn/eng/xw/zyjh/202405/t20240530_11341037.html (Dec. 10, 2024).
-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2023. "European Union-Singapore Digital Partnership (EUSDP)." <https://www.mti.gov.sg/Trade/Digital-Economy-Agreements/EUSDP> (December 10, 2024).
- Musoni, Melody, Poorva Karkare, Chole Teevan, and Ennatu Domingo. 2023. "Global Approaches to Digital Sovereignty: Competing Definitions and Contrasting Policy." <https://ecdpm.org/application/files/7816/8485/0476/Global-approaches-digital-sovereignty-competing-definitions-contrasting-policy-ECDPM-Discussion-Paper-344-2023.pdf> (September 8, 2024).
- Newman, Edward and Stefan, Cristina G.. 2020. "Normative Power Europe? The EU's Embrace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a Transitional International Order."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58 (2): 472-490. DOI: <https://doi.org/10.1111/jcms.12953>
- Nishi, Michihiro. 2018. "Data Protection in Japan to Align With GDPR." https://www.skadden.com/-/media/files/publications/2018/09/quarterly-insights/data_

- protection_in_japan_to_align_with_gdpr.pdf (September 8, 2024).
- Nouwens, Meia, Francesca Maremonti, Mariko Togashi, and Hannah Brandt. 2023. “Europe and the Indo-Pacific: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the Digital Ord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https://www.iiss.org/globalassets/media-library---content--migration/files/research-papers/2024/03/iiss_europe-and-the-indo-pacific-convergence-and-divergence-in-the-digital-order_122023.pdf (November 18, 2024).
- Okano-Heijmans, Maaïke and Vosse, Wilhelm. 2020. “Digital Connectivity Going Global: The Case for Digital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digital-connectivity-going-global> (September 10, 2024).
- Okano-Heijmans, Maaïke and Vosse, Wilhelm. 2021. “Promoting Open and Inclusive Connectivity: The Case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search in Globalization*, 3: 1-10. DOI: <https://doi.org/10.1016/j.resglo.2021.100061>
- Okano-Heijmans, Maaïke, Henry Chan, and Brigitte Dekker. 2022. “Growing Stronger Together: Towards an EU-ASEAN Digital Partnership.” <https://www.clingendael.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8/Growing%20stronger%20together.pdf> (September 28, 2024).
- O’Mara, Stacy and O’Neill, Grace. 2025. “Cybersecurity Regulatory Harmonization Hearing Highlights Need for Public Private Sector Partnerships.” <https://www.centerforsecuritypolicy.org/insights-and-research/cybersecurity-regulatory-harmonization-hearing-highlights-need-for-public-private-sector-partnerships> (July 8, 2025).
- Oxford Analytica. 2020. “EU Rejects Premise of Binary Choice on Huawei.” <https://dailybrief.oxan.com/Analysis/DB251019/EU-rejects-premise-of-binary-choice-on-Huawei> (September 18, 2024).
- Oxford Analytica. 2021. “Balkanisation of the Internet Will Rise.” <https://doi.org/10.1108/OXAN-DB262116> (November 14, 2024).

- Pace, Michelle. 2007. "The Construction of EU Normative Power."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5 (5): 1041-1064. DOI: <https://doi.org/10.1111/j.1468-5965.2007.00759.x>
- Pangotra, Aditi. 2024. "Navigating the Draft National Data Governance Framework Policy." <https://www.cyberpeace.org/resources/blogs/navigating-the-draft-national-data-governance-framework-policy> (November 20, 2024).
- Paulus, Alexandra. 2024. *Building Bridges in Cyber Diplomacy: How Brazil Shaped Global Cyber Norms*.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 Perez, Christian. 2022. "Why China's New Data Security Law Is a Warning for the Future of Data Governance."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1/28/china-data-governance-security-law-privacy/> (September 20, 2024).
- Pierson, Paul.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2): 251-267. DOI: <https://doi.org/10.2307/2586011>
- Pijović, Nikola. 2021. "The Cyberspace 'Great Game'. The Five Eyes, the Sino-Russian Bloc and the Growing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Cyberspace Norms." *2021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yber Conflict (CyCon)*: 215-231. DOI: <https://doi.org/10.23919/CyCon51939.2021.9468296>
- Pohle, Julia and Thiel, Thorsten. 2020. "Digital Sovereignty." *Internet Policy Review*, 9 (4): 47-67. DOI: <https://doi.org/10.14763/2020.4.1532>
- Polatin-Reuben, Dana and Wright, Joss. 2014. "An Internet with BRICS Characteristics: Data Sovereignty and the Balkanisation of the Internet." <https://www.usenix.org/system/files/conference/foci14/foci14-polatin-reuben.pdf> (September 20, 2024).
- Pollack, Mark A.. 2016. "Living in a Material World: A Critique of 'Normative Power Europe'." In Hubert Zimmermann and Andreas Dür, eds., *Key Controversies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pp. 198-204.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 Pop, Florina, Bezemer, Jannigje, and Grant, Laura. 2022.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 Creating Accountability for Online Platforms and Protecting Users' Rights?" <https://www.eipa.eu/blog/the-digital-services-act-creating-accountability-for-online-platforms-and-protecting-users-rights/> (September 20, 2024).
- Radic, Lazar. 2024. "India Should Question Europe's Digital-Regulation Strategy." *Truth on the Market*. <https://truthonthemarket.com/2024/04/12/india-should-question-europes-digital-regulation-strategy/> (September 10, 2024).
- Rana, Vishal and Azeez, Govand Khalid. 2025. "Southeast Asia's Quest for Digital Sovereignty."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3/southeast-asias-quest-for-digital-sovereignty/> (July 4, 2025).
- Renard, Thomas. 2018. "EU Cyber Partnerships: Assessing the EU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Third Countries in the Cyber Domai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9 (3): 321-337. DOI: <https://doi.org/10.1080/23745118.2018.1430720>
- Rim, Hyun Ji. 2023. "Th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Dominating, and Managing Networks." *Asian Perspective*, 47 (1): 1-25. DOI: <https://doi.org/10.1353/apr.2023.0000>
- Risse, Thomas and Sikkink, Kathryn. 1999. "The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into Domestic Practices: Introduction." In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eds.,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pp. 1-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nde, Daniel F., Savoy, Conor M., and Murphy, Owen. 2020. "Post-Pandemic Infrastructure and Digital Connectivity in the Indo-Pacific." <http://www.jstor.org/stable/resrep26994> (September 10, 2024).
- Ryngaert, Cedric and Taylor, Mistale. 2020. "The GDPR as Glob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JIL Unbound*, 114: 5-9. DOI: <https://doi.org/10.1017/aju.2019.80>
- Säär, Anni and Rull, Addi. 2015.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EU: Exporting

-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ICT Solutions to Other EU Member States.” *TalTech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5 (2): 5-29. DOI: <https://doi.org/10.1515/bjes-2015-0011>
- Sadoian, Leah. 2024. “GDPR’s Influence on Indian Data Protection Practices.” <https://www.upguard.com/blog/gdprs-influence-on-indian-data-protection> (January 5, 2025).
- Salminen, Nathan and Campbell, Ryan M.. 2025. “CISA Reevaluating It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https://www.hoganlovells.com/en/publications/cisa-reevaluating-its-critical-infrastructure-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July 10, 2025).
- Scott, Shirley V. and Bloomfield, Alan. 2017. “Norm Entrepreneurs and Antipreneurs: Chalk and Cheese, or Two Faces of the Same Coin?” In Alan Bloomfield and Shirley V. Scott, eds., *Norm Antipreneurs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to Global Normative Change*, pp. 231-250. London: Routledge.
- Segate, Riccardo Vecellio. 2019. “Fragmenting Cybersecurity Norms through the Language(s) of Subalternity: India in ‘the East’ and the Global Community.”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32 (2): 78-138. DOI: <https://doi.org/10.7916/CJAL.V32I2.3371>
- Shen, Hong. 2016. “China and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Toward an Alterna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 (3): 304-324. DOI: <https://doi.org/10.1080/17544750.2016.1206028>
- Sicurelli, Daniela. 2016. “The EU as Normative Power.” In Hubert Zimmermann and Andreas Dür, eds., *Key Controversies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pp. 192-198.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 Sjursen, Helene. 2006. “The EU as a ‘Normative’ Power: How Can This B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3 (2): 235-251. DOI: <https://doi.org/10.1080/13501760500451667>
- Smith, Hanna. 2023. “The Geo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Changing Identity.”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45 (8): 1219-1234. DOI:

<https://doi.org/10.1080/07036337.2023.2277329>

- Stimmer, Anette. 2019. "Beyond Internalization: Alternate Endings of the Norm Life Cyc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3 (2): 270-280. DOI: <https://doi.org/10.1093/ISQ/SQZ001>
- Strowel, Alain and De Meyere, J.. 2023.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Transparency as an Efficient Tool to Curb the Spread of Disinformation on Online Platforms." *JIPITEC*, 14 (1): 66-83.
- Svantesson, Dan Jerker B.. 2013. "A 'Layered Approach' to the Extraterritoriality of Data Privacy Laws."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3 (4): 278-286. DOI: <https://doi.org/10.1093/idpl/ipt027>
- Tan, Sharon and Nurul Syahirah Azman. 2019. "The EU GDPR's Impact on ASEAN Data Protection Law." <https://www.financierworldwide.com/the-eu-gdprs-impact-on-asean-data-protection-law> (September 18, 2024).
- The White House. 2024a. "2021-2024 Quadrennial Supply Chain Review."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4/12/20212024-Quadrennial-Supply-Chain-Review.pdf> (January 13, 2025).
- The White House. 2024b. "FACT SHEET: Two Years after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Celebrates Historic Achievements in Bringing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s Home, Creating Jobs, Supporting Innovation, and Protecting National Security."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8/09/fact-sheet-two-years-after-the-chips-and-science-act-biden-%E2%81%A0harris-administration-celebrates-historic-achievements-in-bringing-semiconductor-supply-chains-home-creating-jobs-supporting-inn/> (January 13, 2025).
- Tocci, Nathalie. 2008.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Normative Foreign Policy Actor." *CEPS Working Documents No. 281*. <http://dx.doi.org/10.2139/ssrn.1337970> (September 18, 2024).
- Tseng, Ken-ying, Sam Huang, and Kai, Roger. 2023. "Enterprises Should Assess and Respond to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Cross-Border

- Transfers of Personal Data in Advance.” <https://www.leeandli.com/EN/NewslettersDetail/7198.htm> (November 18, 2024).
- Tseng, K.-Y. and Huang, S.. 2024. “Data Protection & Privacy 2024 Taiwan.” <https://practiceguides.chambers.com/practice-guides/data-protection-privacy-2024/taiwan/trends-and-developments> (November 18, 2024).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5. “An Open and Secure Internet: We Must Have Both.”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5/05/242553.htm> (December 8, 2024).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The Clean Network.” <https://2017-2021.state.gov/the-clean-network/index.html> (December 8, 2024).
- van, José. 2018. “Epilogue: The Geopolitics of Platform Societies.” In José van Dijck, ed., *The Platform Society*, pp. 163-16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eebel, Viljar. 2019. “European Union as Normative Power in the Ukrainian-Russian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6: 697-712. DOI: <https://doi.org/10.1057/s41311-018-0156-y>
- Voigt, Paul and Von dem Bussche, Axel. 2017.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A Practical Guide*.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Wagner, Gerhard, Eifert, Martin, Metzger, Axel, and Schweitzer, Heike. 2021. “Taming the Giants: The DMA/DSA Package.”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58 (4): 987-1028. DOI: <https://doi.org/10.54648/cola2021065>
- Wahl, Thomas. 2019. “Cybersecurity Act Introduces Cybersecurity Certification and Strengthens EU’s Cybersecurity Agency.” <https://eucrim.eu/news/cybersecurity-act-introduces-cybersecurity-certification-and-strengthens-eus-cybersecurity-agency/> (November 25, 2024).
- Whitman, Richard G.. 2013. “The Neo-normative Turn in Theorising the EU’s International Presen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8 (2): 171-193. DOI: <http://doi.org/10.1177/0010836713485538>
- Wheeler, Tom. 2024. “Crossing the Regulatory Rubicon: The Future of Digital

Regulation is Being Defined in Europ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crossing-the-regulatory-rubicon-the-future-of-digital-regulation-is-being-defined-in-europe/> (January 13, 2025).

Xinhua News Agency. 2022. “China to Implement New Regulation on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Services.”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english.www.gov.cn/news/topnews/202201/04/content_WS61d3f8fbc6d09c94e48a31d1.html (January 4, 2022).

Zha, Dao-jiong and Dong, Ting. 2022. “China in Inter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5 (2): 187-201. DOI: <https://doi.org/10.1080/17538963.2022.2067690>

Zhao, Ming-hao. 2023. “Infrastructure Statecraft and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 *The China Review*, 23 (1): 45-77.

Zhao, Yue-zhi. 2010. “China’s Pursuits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Hopes, Follies and Uncertainti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 (3): 266-289. DOI: <https://doi.org/10.1080/17544750.2010.499628>

